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

西安地方志



2015 · 3

(总第234期)



2015年6月16日上午，省志办主任王锦春一行到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调研。市委常委、副市长吴义勤，市政府副秘书长周爱全向调研人员介绍西安市地方志事业发展情况。

翻阅《西安地方志》杂志



参观信息中心，了解西安地情网和地情资料数据库建设和运行情况。

与市志办领导和各处室负责人座谈



目 录



西安地方志

2015·第3期

(总第234期)

陕新出连内印字第00016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历代名人与西安

- 金仁问——新罗国常驻唐都长安“大使”
..... (3)

学术交流

- 万里丝路 千古灞桥
——浅谈隋灞桥遗址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及其保护问题 刘琦 贺凌飞 (5)

人物春秋

- 西安抗日名将——关麟征 (11)

史料钩沉

- 抗战期间牺牲了多少共产党将领 (15)
老一辈革命家严立规矩防腐 (18)
中国古代如何惩治贪官 (21)
清代也曾颁发过“控烟令” (24)

西安风情

- 西安城门趣闻(十一)——尚武门 (27)
汉阳陵博物馆 (29)

我们的村落

- 西桃园村 (30)
东桃园村 (33)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

- 栎阳镇卷子村背芯子 富小云 整理 (35)

文史拾趣

- 端午节的由来与传说 (36)
汉代的“麟趾金” (37)

- 百年前中国人怎么炒股 (39)
说说古代的“公车”消费 (41)

志鉴动态

- 省志办主任王锦春一行到西安市志办调研
..... (43)
省志办主任王锦春一行调研长安区地方志工作
..... 蒲满庆 (43)
《西安市志·自然地理资源分志》评审会召开
..... (44)
《长安志·长安志图》校点本获陕西高等学校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45)
我办姚敏杰副主任参加中国版协第十五期年鉴编
纂高级研讨班并作专题讲课 (45)

知识窗

- 古时说发型多半是在谈年龄 (46)
立夏为什么要吃蛋呢? (46)
八路军番号由来 (47)
西安第一家正规电影院——阿房宫电影院
..... 封五昌 (48)

历代诗人咏长安

- 曲江三章,章五句 (唐)杜甫 (49)

解字

- “卯” (38)
“勿” (56)

名句欣赏

- 【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举事以自为者,众去之。】
等五句 (42)

文苑

- 给张秉杰主任的一封信 田周民 (51)

《西安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主任:冯艳阳
副主任:姚敏杰 任昆明 张 帆
王 莹
委员:崔义萍 杨军亚 高长安
姚文东 崔桂琴 富小云
张 耀 高 鹏

《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主 编:姚敏杰
副 主 编:高长安 宋亚颖
责任编辑:何彩云

主办: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地址:西安市凤城八路 109 号市政府
大院 26 号信箱

邮编:710007

西安地情网:www.xadqw.cn

西安市地情资料信息中心基础数据库
[http://www.xadqw.cn/diangzhinew/
index.jsp](http://www.xadqw.cn/diangzhinew/index.jsp)

E-mail:changannan6861@sohu.com

电话:029-86788731

金仁问

——新罗国常驻唐都长安“大使”

金仁问(629—694),新罗武烈王之子,新罗文武王的弟弟,曾在674年被唐高宗封为新罗王。其一生大多数时间是在长安城度过,在唐宿卫的实际时间为25年,担负外交使命的时间则长达43年。曾以“国使”的身份,数次往返于两国之间,史有所谓“七入大唐”之说。关于这一点,《唐书》及《三国史记》均有记载。

金仁问20岁左右,正值朝鲜半岛局势大动荡时期,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各方都企图吞并其他两方,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由于新罗对形势分析透彻,把握时机,策略运用得当,最后赢得了统一事业和巩固统一事业的胜利。作为新罗来说,自己要在三国角逐中最后克敌制胜,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争取到唐朝的同情、支持和实质性的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隋朝时,新罗就两次以高句丽入侵为由,遣使请援,这是隋炀帝出兵高句丽的原因之一。唐朝建立后,新罗又于625年、642年多次遣使向唐朝廷诉讼高句丽、百济阻断其入唐朝贡的通道和屡次入侵新罗的“罪行”。起初,唐朝正值立国,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希望有一个平静的边疆环境,所以对新罗的请求没有完全满足,而是先后派朱子奢(谏

议大夫、弘文馆学士)、相里玄奘(司农丞)出使三国,竭力劝说三国“连和”。金仁问的父亲金春秋为了得到唐朝的认可和支持,做了许多工作,终于说服了唐太宗。紧接着,金春秋更请改章服,“从中华制”,再次表示对唐文化的景仰及对唐朝的友好,于是唐太宗不仅赐予章服,而且还授其父子以官衔,最后又设饯宴诏令三品以上官员前来送行。金春秋则借此机会提出送子入朝“宿卫”的请求。自此之后,新罗“一意事中国,使航贡,相望于道”。至此,大唐朝廷无论从情感、策略还是实际行动上都完全倾向于新罗一边,“唐罗联盟”缔结。

金仁问的历史功绩首先体现在作为新罗国常驻唐朝“大使”的外交周旋方面,他延续和加强了唐朝与新罗的友好关系。651年,金仁问被派遣入唐宿卫并从此成为常驻“大使”。从651年至694年,他绝大多数时间在长安,协调新罗与唐朝的关系。金仁问沿着其父金春秋所开辟的道路,继往开来,使“唐罗联盟”得以不断加强、巩固,使唐朝的军事支持和援助真正变成事实。于是,“唐罗联盟”从此开始具有“军事联盟”的性质。自此以后,唐朝对新罗的请兵求援,几乎是每求必应。也正

● 历代名人与西安 ●

因为这样，半岛三国力量对比的形势开始转变，明显地有利于新罗，而高句丽、百济两国则从此处在唐罗联军的夹击、两头受气的不利形势之中。由此不难看出，金仁问在新罗外交史上的地位是多么重要。

金仁问的“七入大唐”，除“宿卫”外，主要的任务在于：一是代表新罗向唐朝请兵以及根据唐朝的要求回国征兵或协调两国的军事行动，二是接受唐朝的军事咨询，诸如唐高宗在出兵讨伐百济前，向其了解百济“道路险易，去就便宜”之类，三是代表新罗执行朝贡使命，参加唐朝的国事活动如祭祀泰山之类。

诸多事实表明：金仁问的确是新罗派驻唐朝的一名外交重使，在唐朝享有很高的信誉，赢得了朝野的好评。其大量的外交活动对“唐罗联盟”的巩固起到了促进作用，对新罗的统一事业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金仁问在充当“常驻唐朝大使”，为两国间的外交事务，特别是协调“唐罗联盟”的军事行动而忙碌的同时，还亲自出生入死，征战于疆场，立下了汗马功劳。金仁问入唐宿卫以后至平高句丽，唐罗联军对百济、高句丽大的军事行动共有6次，实质上是充任军事联络官；在许多战役中，金仁问往往是被派作前锋，首先与唐军会师。

客观地讲，在新罗作为一个弱者不断地反抗邻国侵略、为半岛统一事业而战，为维护、巩固统一事业而战的背景下，金仁问受命于危难之时，以其超人的胆识和勇气，数次往

返于新罗、唐朝两国之间，不辱使命，圆满地完成了身负的外交重任；同时也将自己的热血挥洒疆场。从而为自己的国家、民族，也为唐罗两国的友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金仁问被封为新罗王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新罗在争取唐的援助，先后攻灭百济、高句丽后，对于如何处理百济故地与高句丽残余势力的问题上，与唐朝廷发生了分歧，两国间和战不定。674年，唐高宗以新罗文武王“纳高句丽叛众，又据百济故地，使人守之”为由，下诏削去新罗王的官爵，册立在唐宿卫的金仁问为新罗王，让他归国以取代文武王。与此同时又派刘仁轨、李弼、李谨行率军进讨。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文武王为了缓和矛盾，争取时间积蓄力量，巩固业已实现的统一局面，于是恢复了与唐的朝贡关系，同时表示“谢罪”。金仁问原本就不愿意唐高宗封王，“恳辞”没有获得准允，这才无奈登程还国；恰逢文武王遣使入唐朝贡，金仁问于是中途返回长安，主动请辞高宗所封王位。这件事也改变了金仁问的余生，自这次还唐以后，金仁问长期留居唐朝，而且声誉日高，679年晋爵为镇军大将军行右威卫大将军，689年再晋爵为辅国大将军、上柱国、临海郡开国公、左羽林军将军。

据《三国史记》记载，694年金仁问病故于长安。唐朝将其遗体送回新罗。金仁问在新罗被受谥号“太大角干”，葬于新罗首都庆州的西部。



西安抗日名将 ——关麟征

关麟征(1905-1980),原名志道,字雨东。汉族,陕西户县人,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用兵以稳、准、狠著称,长于急袭的千里驹师的首任师长,生性傲岸,有陕西冷娃之称,部将杜聿明、郑洞国,刘玉章、覃异之、张耀明皆一时之名将。因作战有功,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一枚。抗日战争时期是关麟征一生戎马生涯的黄金时代,他曾自我评价说:“我的一生是打日本鬼子的一生。”著作有《关麟征回忆录》等。

1905年4月7日出生于户县真花碛村(现改为振华威村)一户普通的农民家中。幼时在本村私塾读书,9岁转到邻村小学,15岁进入陕西省立第三中学。后因家中迭遭变故,负债累累,中途辍学。决心弃文学武,投军从戎,更希望能挣钱帮助家庭还债。

1924年初,一位朋友邓毓玫悄悄告诉他,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开办一所军官学校,秘密招生。他们弄到一张胡景翼处签发的署名邓毓玫和吴麟征的护照,因为吴麟征嫌广东太远不想去,遂问关志道想不想去广州投考军

校,如果愿去,只要将护照上的吴改成关就行了。这一消息使他喜出望外,立即答应。他回家禀明情况,携带父亲卖牲口的25块银圆作为旅费,把护照上的“吴麟征”改为“关麟征”,从此关志道就改名关麟征。进入了黄埔军校第一期,被编为第三队,并参加中国国民党。

毕业后即参加黄埔学生军东征,讨伐盘踞东江的军阀陈炯明。被分配在何应钦任团长的军校教导第一团二营五连二排任少尉排长。后受伤被送到广州公立医院治疗,医生根据他的伤情,要把他的左腿锯掉。适逢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来医院探望受伤官兵,极力反对截肢,并与医生商量研究,要求精心治疗,这样才保住了左腿。

1925年末至1926年初,先后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总队长严重的中尉副官、第四期入伍生团上尉连长、学生队队长等职。1926年任国民党宪兵团三营少校营长,随军北伐。1927年到南京,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直属补充第七团团长。1928年任国民党军总司令部警卫第二团团长,不久调任十一师六十

●人物春秋●

一团团长、第三十二旅旅长。

1930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爆发了中原大战,作为第二教导师一旅一团团长,随军开赴中原战场。因为有功,随即升任该师第二旅旅长。蒋介石亲自坐镇河南商丘西部的柳河车站指挥战斗时,用“空城计”阻滞了阎、冯军的前进,保住了蒋介石的安全。自此深受蒋介石的赏识和黄埔同学的钦佩。关麟征作战机智勇敢,擅长指挥的名气不胫而走,时年26岁。1931年,任第四师十一旅旅长。

1932年6月,蒋介石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作为第四师独立旅旅长,奉命随徐庭瑶第四师进攻鄂豫皖,因突围时的战功,独立旅扩编为25师(千里驹师)。

1933年3月,奉命率25师随17军军长徐庭瑶北上,参加长城抗战。亲率一团猛烈反击日军。被枪榴弹炸伤五处,成为血人,身旁官兵十余人全部战死,仍毫不动摇,从容指挥部队英勇杀敌,终于击退了敌人,占领潮河支流北岸(干沟)高地。25师在古北口和日军西义一的第八师团血战三昼夜,伤亡4000余人。关麟征因此获得青天白日勋章。《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亲自撰写社论“爱国男儿,血洒疆场”,以贺其功。

1933年5月,25师奉命开到北平北郊休整,在北平郊区25师兵营,组织开办5000人的大、中学生军事训练班,派参谋作军事知识讲座,派营、连长对学生进行军事操练,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日战争进行了准备。

1935年7月,何应钦与日方签订《何梅协定》,其中条文规定:国民党中央部队和宪兵要撤出北平和河北省。得知此消息后,亲往北平拜谒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恳切陈词:“如果部队不战而退出北平和河北省,党国将丧失民心!”并建议何应钦加强军备与日军作战。与此同时,还向南京蒋介石发出电报,并且命令25师全体官兵立即在北平城郊构筑工事,准备与日军作战。可惜没有被采纳。是年秋,25师奉命开赴洛阳休整时,一些曾参加过军训的学校师生专程到长辛店为25师将士送行,关麟征为群众的热情所感动,对送行的师生表示:部队不得已奉命南开,没有尽到继续抗击日军侵略的责任,有负北平同胞的期望。相信政府和全国军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终究会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1937年,关麟征升任52军军长,辖第2师(师长郑洞国),第25师(师长张耀明),投入抗日战争。是年秋冬,率部队在平汉铁路从事抗日斗争。9月参加了保定战役。除指挥本部两个师外,还指挥赵寿山的17师和曾万钟第三军2个师,被日第一军香月清司部迅速突破,这是他打的最窝心的一仗。10月,日军第十四师团及第六、十六师团各一部在冀南由肥乡、成安、临漳等县进犯漳河,他率52军在漳河南岸与日军土肥原贤二的14师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攻防战,使日军向漳河北岸邯郸、武安一带败退。从侦察员报告中得知日军在邯郸城外建有飞机场和汽油库,便立即抽调营长梁智伟率一营部队夜袭机场,烧毁

日本飞机 10 余架,缴获大批枪械弹药,受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电令嘉奖。

漳河战役后的冬天,52 军开赴河南漯河一带进行休整补充。关麟征总结了自古北口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加强了部队的战术教育和射击训练,并且对全军将士进行了抗击日本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参加平汉铁路战斗后又转战河南、山东。1938 年春率部参加台儿庄会战。3 月 24 日,指挥部队向盘踞在津浦铁路台枣支线的日军第 10 师团濑谷旅团发起进攻。针对日军白天战斗活跃、晚上龟缩不动的情况,采用夜战火攻战术,命令部队昼伏夜出,消灭敌人。3 月 31 日下午,由临沂南下的日军坂垣征四郎的第 5 师团沂州支队 4000 人,突然袭击 52 军指挥部。当时,关麟征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营的兵力约 300 人。但他沉着冷静,命令警卫连在离指挥部千米以外的地方展开佯攻,以迷惑敌人。及至黄昏,援军赶到,立即指挥部队对日军突然实行反包围。敌军仓促应战,伤亡众多,其骑兵部队全部被歼。4 月初,加速对台儿庄日军的攻击,从台儿庄北面完成对日军的包围。4 月下旬,奉令开至峰县以东、邳县以北防守,将日军国崎支队包围在码头镇西的北涝沟,给敌以重创,仅日军四一、四二联队伤亡就达 1400 多人。

台儿庄大捷后,关麟征升任第 32 军团长。蒋介石声称:“中国军队如都像五十二军那样战斗力强,打败日本军队是不成问题的。”时人则称台儿庄战役中负责防守的孙

连仲和负责攻击的关麟征为“孙钢头”和“关铁拳”。

徐州会战结束后,关麟征 32 军团经徐州以北向归德(商丘)撤退,行至豫皖两省交界处碭山与杨集之间,欲通过一座桥时遇到了困难。因为桥西已被日军占领,敌人用八挺重机枪封锁桥上通道。几次组织兵力冲锋都未能突破敌人封锁线。关麟征勃然大怒,遂将从蒙古定远营中得来的良马 16 匹集中起来,并挑选勇敢机智的士兵驾驭,他一马当先,率领战骑突然向西面桥头飞驰而去,桥头敌人的机枪尚未开火,16 匹战骑已经冲到,机枪手仓皇失措,弃枪而逃,后续部队全部冲过桥去,到达归德。关麟征勇猛战斗的佳话传遍国民党军界,从此获得了“关猛”的雅号。

1938 年夏秋之交,32 军团参加武汉保卫战。8 月,关麟征率部在瑞昌、阳新一带阻击日军。命令部队依山地形势,在每个山头修筑工事,把几个山头组成一个棋盘阵地,一个山头受敌攻击,其他山头可以立即配合出击,歼灭敌人。因而日军进攻十几天,寸土未得,遗尸累累,士气低落。武汉撤退时,他又指挥部队殿后,广布散兵线,施行运动防御,安全掩护大部队撤出。

1939 年秋,关麟征升任 15 集团军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指挥 6 个军坐镇湘北,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凭借伯陵防线迎击进犯湘北的日军第六师团。此役敌我伤亡惨重,关部仅连排军官就牺牲 600 余人。后日军上村支队在 15 集团军后方营田奇袭登陆,关麟

●人物春秋●

征发现日军有围歼 15 集团军的企图,果断命令主动后撤,退而不乱,20 万大军,军纪严明,井然有序。随军记者对关麟征组织领导军队的才能深为敬佩。10 月 2 日,国军退至长沙外围,日军陷入湘北湖沼,已呈疲惫之势。195 师长覃异之发现日军有退却迹象,迅速上报,关麟征抓住战机,果断地组织指挥部队实施反攻。由于这是开战以来第一次收复失地,升任 15 集团军总司令,记功一等。成为黄埔将领中担任集团军总司令的第二人(1939 年 8 月 4 日胡宗南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成为黄埔系学生的第一个集团军总司令),年方 34 岁。

1940 年日军占领越南逼近桂滇,切断了中国滇越国际交通线,因何应钦向蒋介石力荐,关麟征奉命率第 15 集团军由长沙进入广西边境驻防,不久又调防云南,7 月部队改编为第 9 集团军驻防滇南国境。

1944 年 12 月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成立,下辖四个方面军,关麟征升任第一方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卢汉)。1945 年 5 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麟征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0 月 8 日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因害怕他不能搞好和苏联的关系,未上任就被改派为云南省警备司令。

1946 年 7 月被调到成都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次年蒋介石辞去各军校校长兼职后,升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任校长(第一任蒋介石,黄埔生中升任该校校长的第一人)。1948 年 8 月被任命为国民党陆军副总司

令,仍兼任军校校长。随后,蒋介石又要他出任陆军总司令,报纸上已登载消息。但国防部以“溪口电话手令遗失”为由,使此事告吹。不久,国民党政府又酝酿他出任京沪杭警备司令,后来又以“不懂上海话”而作罢。李宗仁担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时,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

1949 年秋,关麟征辞职,退出军界,并把一家老小送到香港居住。11 月,偕夫人从成都乘飞机前往台湾。在香港机场小憩时,他告诉同机旅伴“去探望病中的父亲,随后来台”。但此后未去台,而是一直居住香港。深居简出,整日以临摹于右任书法和阅读《孙子兵法》为乐趣。其草书曾参加过香港大会堂的展出。

1980 年 8 月 1 日,关麟征逝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纸都登载了他逝世的消息和简历。徐向前元帅向他在香港的家属发去了唁电:“噩耗传来,至为悲痛,黄埔同窗,怀念不已,特此致唁,诸希节哀。”





2014年12月25日，台湾防卫事务部门公布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为主题的勇士国魂月历，列出中国共产党将领左权为殉国将领。

抗战期间牺牲了多少共产党将领

长期以来，对于抗战期间牺牲的中共将领群体的考证与认定问题，在人们的认知乃至学术研究上一直是个空白，由此导致很多人认为，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部队只牺牲了1位将领，而国民党部队却牺牲了100多位将领。这种认识误区直接影响到人们客观、理性地认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及其评价。

如何界定这个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群体呢？这首先需要我们把中共领导的抗日部队的发展置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来考察。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开始了局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艰苦抗战，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中国整整经历了14年的抗战。在这14年中，中共领

导下的抗日部队逐步由散兵发展到正规军，特别是在1937年后，中共抗日部队逐渐发展成为包括国民革命军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等在内的部队。

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这支人民军队战斗在华北、华中、华南、东北等广袤国土上，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殊死搏杀。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再到全国全面抗战路线的形成，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共领导的抗日部队除坚持了游击战等敌后战场作战、开辟抗日根据地外，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坚持人民战争，紧密配合国民党的正面战场

●史料钩沉●

作战，为打败日本侵略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许多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5年的8年全面抗战中，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人员损失共584267人，其中伤290467人，牺牲160603人，被俘45989人，失踪87208人。当然，这里面还没有包含1931年至1937年间的军人伤亡，也没有包含东北抗联的伤亡。

那么，在14年抗战中，有资料可查的中共抗战先烈中到底有多少位是将领呢？经过初步考证，在与国民党部队牺牲的同等级别的将领对比研究中发现，仅东北抗联就有70多位中共将领在抗战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造成人们对中共将领群体认识的缺失与失真的原因有很多，不仅仅有今天学术研究上的空缺与偏差，同时还有历史造成的种种原因。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抗战中牺牲的许多中共部队高级军官，本来与国民党军队将领级别相当，但并没有被授予同等的军衔。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3个师、每师编制1.5万人，师辖两个旅，每个旅辖两个团。国民党当局又于1937年10月12日宣布，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边界地区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红二十八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下辖四个支队。红军经过改编后，就八路军而言，与改编前相比人数虽未减少，但编制级别却大大降低，主要表现在，由原来的三个方面军改为三个师，有的军级编制降为营级

编制，如原红二十九军改编为第一二九师特务营，原红三十军改编为第一二九师炮兵营，原红军独立第一师和陕北独立团改编为第一二〇师特务营。在此次改编过程中，大多数红军干部不得不降级使用，许多高级将领“官降三级”，甚至“官降四级”。方面军总指挥当师长，军团长当旅长，军长当团长。如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任第一二〇师师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萧克任第一二〇师副师长，官降四级。如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任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红六军团军团长陈伯钧任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旅长，官降四级。如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杨得志任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团团长，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师长韩先楚任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副团长，官降三级、两级不等。这就导致后来在抗战中牺牲的中共部队的将领，许多本来与国民党军队中将领级别相当，应当是将领，但并没有被授予同等的军衔。如1938年4月18日牺牲的叶成焕烈士，红军改编时由师政委改任团长。如果根据国民政府当时授予旅长以上为少将的规定，叶成焕烈士理应为将军。

2、国民党为了限共、防共，没有给共产党将领以同等待遇。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为了拉拢人心，以求壮大自己的力量，试图削弱共产党，独享抗战胜利成果，对国民党将领甚至对一些坑害人民的土匪授予将领等职，而对共产党高级将领却极其苛刻。如1943年任命甘肃土匪马步芳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1949年5月18日，再次任命其为代理西北军政长

官,同时他获得了陆军中将加上将军衔。1941年2月,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李长江率所部8个支队投靠国民党,被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等等。

3、抗战期间,中共部队在军衔制上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制度和管理体系。

纵观整个抗战期间,中共部队在军衔制上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制度和管理体系,这是造成抗战期间中共领导的部队一直没有统一的军衔,乃至军官牺牲后也没有进行军衔上的追加和认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共部队从初创到抗战初期在待遇方面都是平等的。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的,红军“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这种办法在军队中实行了很长时间。因此,那个时候军队内部还没有明确的等级观念,官兵待遇基本上是一样的。因此,从中共领导人的谋略上看,也就谈不上实行军衔制的问题。

七七事变以后,为了国共合作和促成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又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是有军衔的,并且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军衔体系,所以中共部队在这个时候提出了军衔问题。1939年4月2日,八路军以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的名义,给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发电,正式提出了在我军内实行军衔制度的建议,并正式发文对军衔的评定标准做了明确规定。此后,有一部分中共将领被授予了军衔,如当时的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被授予了中将军衔,第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第三五八旅旅长卢冬生等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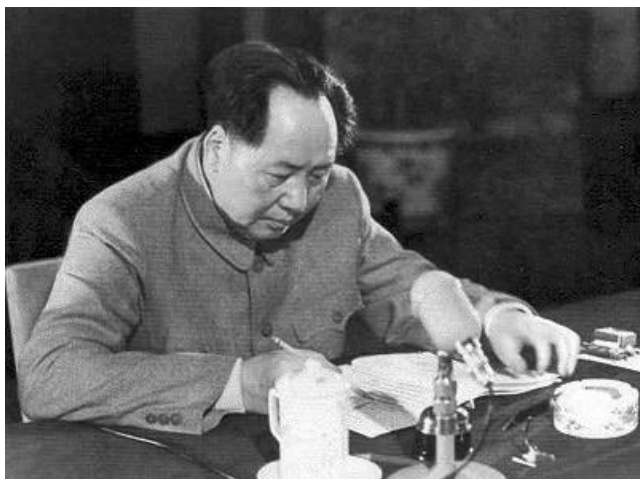
授予少将军衔。实际上,中共部队在这一时期被授予军衔的只是少数人。

4、中共部队一直没有按照国际惯例,追加在抗战中牺牲的将领军衔。

二战中,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苏联、美国等都曾对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嘉奖的同时,普遍追加了军衔,就连加害国日本的军队也不例外。如,1937年8月29日,侵华日军第三师团步兵五旅团步兵六联队队长仓永辰治步兵大佐,在入侵上海吴淞铁路码头的作战中,被中国军队击毙,死后被追晋为陆军少将。1939年6月17日,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第十三军十五师团步兵团团长田路朝一陆军少将,在安徽南部的一次战斗中,被中国军队击毙,死后被追晋为陆军中将。国民政府方面,如第七十九军中将军长王甲本在衡阳保卫战中壮烈殉国,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南京保卫战中牺牲的萧山令等几位少将,后均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中将,等等。但对于中共领导的抗日部队牺牲的将领们来说,截至目前,没有对他们进行过军衔上的追加。

5、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授予军衔时,对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中共将领仅仅追认为烈士,并没有进行军衔上的追加。

1955年在全国授予军衔的时候,只是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中共将领进行了军衔授予。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了自己的10位元帅、10位大将、57位上将等等。但对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官兵仅仅是追认为烈士,并没有进行军衔上的追加,贻误了追加抗战期间牺牲的中共将领军衔的最佳时机,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1954年1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老一辈革命家严立规矩防腐

黄金之所以不易变质,是因为它抗腐耐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什么能“拒腐蚀,永不沾”而永葆革命青春,根本的源自他们能够始终坚定革命信仰、时刻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廉洁奉公风范,他们深知: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应该带头遵规守矩,廉洁自律,决不能存有丝毫的特权思想。那么,老一代革命家怎样自觉主动地为自己的思想心灵和言行举止,约定了以身作则、严以律己的反腐规矩,并严格身体力行的呢?

毛泽东的“三不谈”和“三不原则” 毛泽东从小就树立远大志向,培养坚强毅力,到了青年时代,他给自己规定了“三不谈”作为修行准则:不谈金钱、不谈身边琐事、不谈男女恋爱方面的问题。被同学们誉为“身无分文、心忧天下”。1949年7月,湖南解放后,毛泽东家乡的亲戚和朋友们纷纷给他写信,要求推荐参加工作或介绍别人进京。当时,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人民政府各机关部门,由于工作需要,招收了许多新人。也有许

多老干部的家属和亲朋来了,只要历史上没什么问题,一经介绍也就参加工作了。”但毛泽东却说:“别人的亲友可以来,我的不能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要率先律己树立一种风范。他对秘书说:“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像蒋介石一样早垮台。”他进一步对秘书田家英具体订立规矩说:“处理亲友一般来信原则是:凡是要求到北京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凡是要求安排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

周恩来的“三不沾” 周总理掌握着党和国家的大权,他兢兢业业为人民大众谋利益,权力和无私伴随了他的一生。他给自己和身边工作人员早就“约法三章”,规定了“三不沾”:私人的事不坐公车,不沾国家的便宜;亲属来机关探亲,就餐自己买票,不沾集体的财

富；不得以总理的名义接待或收受礼品，不沾机关和个人的利益。不仅如此，周恩来与邓颖超还对亲戚晚辈进一步严格要求，及早“约法三章”，具体约定了《十条家规》：晚辈来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不许动用公家的车子；不可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许请客送礼；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生活要艰苦朴素；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刘少奇的“四不准” 针对外出视察工作，刘少奇总是同身边工作人员“约法三章”，向身边工作人员专门交待“四不准”：一是每到一地，不要人家接送；二是到任何地方，不准请客吃饭，铺张浪费；三是不准向人家要东西；四是参观时不要前呼后拥地陪同，有个向导引路就行，不要影响地方同志的工作。作为国家主席下去视察不要接送，不准请客吃饭，参观不要陪同，怕铺张浪费，怕影响地方同志的工作，这是刘少奇高度自觉的廉洁自律。这些平凡的生活细节，充分反映出刘少奇作为一名真正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

董必武的“三种行为”和“三不许” 革命老人董必武非常谦逊，他把自己的工作比喻为“三种行为”：当抹布、跑龙套、敲边鼓。这充分体现了德高望重的他甘当人民的勤务员的品格情操。1949年11月，董必武因公去南京，几位随员想把一辆“别克牌”黑色小车要来带回北京。董必武得知后，严肃郑重地提出“三不许”：“不许向地方要东西，更不许以我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活动，不许接受礼物。”从此，

这个“约法三章”便成了董必武和他身边工作人员的抗腐防变的座右铭。

任弼时的“三怕” 任弼时一生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钱多、三怕麻烦人。任弼时的这“三怕”，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性的生动体现，也正是任弼时一生的真实写照、对其人生境界的褒扬。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他戎马一生，征战南北，两次被捕入狱，体弱多病，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一点也没有追求享受，而是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把毕生的心血与精力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彭德怀的“保公三诀” 抗美援朝期间，祖国人民给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寄去了许多慰问品，彭德怀吩咐警卫员全部管起来，分下去。对随意取用慰问品的干部则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说：“管公的人就要这样：第一，自己不贪；第二，别人不送；第三，敢把厚脸皮、熟人挡回去。有这三条，才能保得住一个‘公’字。”并指示管理物资的干部一定要做到这三条。彭德怀说的这三条，人称“保公三诀”。

徐特立的“三个第一” 被尊称为“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一生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称自己这位可敬的老师为党的“坚强的老战士”并高度评价他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这三个“第一”是毛泽东于1937年11月30日在延安为徐特立60岁生日时写下的祝贺信中的核心观点，概括了徐特立光辉的一生。这位1927年5月在白色恐怖中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并以57岁高龄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真正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模范实践者。令人

●史料钩沉●

回味的是,毛泽东在称赞徐特立“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同时,也尖锐指出了“有些人却是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

谢觉哉的“三自” 革命老人谢觉哉把自己批评比作“跟自己打官司”。即自己当被告,自己当律师,自己当法官。他对自己的缺点毫不客气,表现了严于剖析自己的革命精神。

陈毅的“三不要” 陈毅痛恨资产阶级的假公济私行为和利己主义。在担任上海市第一任市长时,他对家人尤其是子女们“约法三章”:一、穿土布衣,大孩子穿了再轮给小的孩子穿;二、不坐公家的小汽车;三、办任何事都要严格按制度来。在父母回四川安家时,他对陪送的同志提出“三不要”:把两位老人直送我妹妹家,不要惊动省委;找普通民房住,不要向机关要房子,安家事宜自己解决;不要向国家伸手。

叶剑英的“五不许” 北平解放后,为严防滋长不良习气,时任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长的叶剑英,对部属提出了五条要求:一不许谈发财(批评的是升官发财)。二不许姻娅同事(防止任人唯亲的裙带关系)。三不许有士大夫气(批评的是脱离实际,食古不化的封建士大夫习气)。四不许鲜衣美食(要求的是艰苦朴素)。五不许空谈主义(反对的是夸夸其谈,不干实事)。

徐海东的“三问” 徐海东将军平日凡是遇见多年不见的战友,总是以“三问”代替世俗的寒暄。一问政治上犯错误没有,二问经济上多吃占没有,三问生活上和老婆闹离婚没有。他爱人周东屏曾提醒他:“多年不见的老同志,怎么好这样问?”他却说:“问问怎么不

行,净说好听的,那算什么共产党员?!”

陶铸、胡耀邦、王鹤寿的“约法三章”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延安许多干部意气风发,准备奔赴全国各地开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一天,陶铸同王鹤寿、胡耀邦在王家坪桃园聚别。他们畅所欲言,敞开心扉谈了很多……最后,这三位志同道合、一身正气的挚友郑重相约终生做到三件事:永远跟着毛主席;永不叛党;永不做吹吹拍拍的事。这年,陶铸37岁,王鹤寿36岁,胡耀邦30岁,正是大有作为的年华。纵观这三位革命同志的一生,他们都始终如一地践行以上约定,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身清白,大公无私,廉正奉公。譬如,陶铸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1967年1月遭到江青等人诬陷,受到残酷迫害。1969年在合肥逝世。但他留给后人的清廉事迹和高尚风格是永世长存的。建国初期,陶铸在广东担任省委书记期间,有一次带领几个干部到外地检查工作。有一个县的领导设宴欢迎,陶铸看到大摆筵席的场面,非常恼火,他毫不留情地对当地干部进行了一顿批评之后,匆匆吃了一碗饭便离开了。此后,陶铸每到什么地方去视察、检查和指导工作,总是要事先约法三章,立下“三不准”的规矩:不准请客,不准迎送,不准送礼。谁违反了就追究谁。再比如,胡耀邦同样对年轻时的以上约定一如既往地坚持了一生。1980年他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当天就给家乡浏阳县打电话“约法三章”:其一,不开庆祝大会;其二,不得因此而在乡里大兴土木;其三,不许挂他的像。胡耀邦为人民树立了一身清白、奉公廉洁的榜样。

中国古代如何惩治贪官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虽然各朝代都有倡廉与惩腐的法律与举措，而且有的惩腐的法律相当详备而酷烈，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封建专制下的腐败问题。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封建社会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有权立法，也可以随时破坏法制，帝王对官员首先要求是“忠”，其次才是“廉”。第二，古代惩贪律令也有特权法色彩，往往是“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有时法律明确规定达官显贵犯罪享有“先请”“八议”等，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权，缺乏公平、公正，其效力自然要大打折扣。第三，立法严而执法宽。越到各王朝的后期越是如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致使法律变成一纸空文，贪官横行，腐败蔓延，成为导致政权覆灭的主要因素。

一、“三风十愆”罪

这是商初的官刑。官刑是针对官吏专门制定的刑罚，以警戒公卿百官。此系商朝总结夏朝灭亡的教训而制定的法律。“三风”即巫风、淫风、乱风，是存在于官僚阶层的三种不良风气。“十愆(qiān, 罪过, 过失)”是三风的具体表现，包括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殉于货色，恒于游、畋(狩猎)，侮圣言，逆忠直，远耆

德，比顽童等，即：经常在宫中舞蹈；随便在官府等处狂歌；贪得财富、美色；迷恋游乐、狩猎；蔑视圣人教导；拒绝忠直之言；疏远德高望重的长者；亲近奸佞小人等等。这些不良风气，“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所以，对此处罚很重，“臣下不匡，其刑墨”，就是说官员若不匡正国君，就要在脸上刺刻印记并涂墨。以后，“三风十愆”罪以各种刑名散见于各代法律，如各朝代选官吏时往往要考察被选拔者是否有恋财、好色、嗜赌、贪杯、玩物丧志等不良嗜好，有不良嗜好者不能入仕。李悝的《法经》规定，太子赌博经两次笞劝无效则更立(改立他人)。对太子尚且如此严厉，对一般官吏自然不会宽松。

二、职务连坐

商鞅变法时首先实行，汉武帝时归入特制的“见知故纵之法”。此法是对国家官吏实行连坐，上对下、下对上均承担连坐责任，实行责任追究。如果对自己的上级或下级官吏的违法乱政行为知而不举则坐以同罪。东汉沿袭西汉法律，如建和元年(147年)下诏：“长吏赃满三十万而不纠举者，刺史、二千石以纵避为罪。”是说对赃官之贪行，刺史、郡守都负有纠举之责，如果失职，也要受到惩处。明朝

●史料钩沉●

规定,属员贪赃,主管连坐。清朝贪官受惩,连坐属员。这一法律对防止官吏互相袒护、互相包庇而乱政害政起了很大作用。有此法,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老好人主义”就行不通。

三、保任连坐

即被推荐和任命的官吏犯罪,推荐和任命者须连坐。此法在秦、唐、宋等朝代均实行。《史记·范雎列传》载:“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宋史·刑法志》记载,宋朝防止官员贪赃枉法有两种办法:一是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作保。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有贪赃行为的官员转正。宋朝还有试用官员犯罪两次就除名的规定。二是某官员犯贪赃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此类法律给用人失察者亮起了“红灯”,促使推荐和任命官吏者尽可能对被举荐者的人品、才学、德行、能力进行全面的了解,有利于防止在任用官吏上的徇私舞弊行为,保证官吏的素质。

四、犯令、废令罪

1975年出土的云梦《秦简·法律答问》里写道:“令曰勿为而为之,是为‘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为‘废令’也。”即法律要求做的不做或法律不允许做却做了的,均属违法犯罪行为,该受惩罚。此法《秦律》首先实行,以后唐、明等朝均设其罪。可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和令不行、禁不止,在中国古代是轻则丢官、重则掉脑袋的罪行。

五、谎报、虚报政绩罪。

自报、指使下属或授意他人谎报、虚报均属此列。此罪《唐律》收入《诈伪》篇,《明律》归入“奸党罪”,清代则入《大清律》,虚报政绩,“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是明令禁止的,触犯者要受到严厉处罚。

六、禁锢

所谓禁锢,就是中国古代对犯罪官吏本人及其亲友终身禁止做官的制度。禁锢属于资格刑,它剥夺的是犯罪人的政治权利。早在《左传》中就有禁锢的记载,从汉至隋,禁锢都作为赃罪的附加罪而存在。东汉本初元年(146年)下诏:“赃吏子孙,不得察举。”即贪官子孙不得当官,可见贪官之贪行,要影响到子孙的前程。晋律中规定官吏贪污,罪不至死者,虽遇赦,仍禁锢终身,有时被禁锢的人,即使解除禁锢仍不能与平民享有同样的权利。后世各朝改禁锢为“永不叙用”。

七、请托说情罪

《唐律·职制》“有所请求条”明确规定,没有使用财物而仅靠人情向主管人员求办某事,也要禁止。“监临势要”(非主管人员)替别人请托,只要开口,就要杖一百;如果枉法,和“监临主司”(主管人员)同等处罚。《大清律》对说情受钱者,则“计赃从重论”。这对拉关系、走后门、说情风均起到遏制作用。

八、奸党罪

这个罪名为朱元璋首创,载于《大明律》。有人说此罪名是“明祖猜忌臣下、无弊不防所定之律”,但从其包含的内容来看,对于整肃

政风有积极的意义。如向皇上进谗言、借刀杀人、蒙蔽圣上、交结朋党、拉帮结伙、破坏朝纲等均属奸党罪,犯此罪本人处斩,妻、子为奴,财产没收。

九、重刑治腐

从量刑上看,对官吏犯罪的法律惩罚重于常人。贪赃受贿的刑事责任远比盗窃为重。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可看出,在秦朝,“通一钱者,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魏书·张袞传》里记载,北魏时,监临官(主管和执行管员)“受羊一只,酒一斛者,罪至大辟”,即死刑。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定律:“义赃(徇私贿赂)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唐律则规定,监临主司(主管官员)受财枉法,受贿相当于一尺绢的,要判处杖刑一百,并且一匹加一等,十五匹判处绞刑。而常人(普通百姓)盗窃,即使五十匹,只是流放服役而已。唐律还规定,官吏间接受财物也要处刑。如官员在其管辖范围内收受百姓财物、牛羊瓜果等供馈,或向百姓借贷财物,役使人力等,均以贪污罪论处,以防止官吏对下属及百姓吃拿卡要、敲诈勒索。惩腐最严厉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大明律》对官吏贪污、受贿等罪所定的条目多而详,而且往往要处以凌迟、挑筋、剥皮实草等酷刑。属员贪赃,主官连坐;父祖贪赃,子孙连坐。清朝将惩贪治吏作为治理国家的“第一要务”,对贪官多“赐令自尽”,连坐属员。有学者对唐宋明清四朝正七品官月俸数与当时

的贪污受贿数额作过比较,结论是当时官吏贪污受贿相当于正七品官一个多月甚至低于一个月的俸禄,就要被绞杀。

十、不赦贪官

中国古代的法规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固定下来的法律条文;另一类是封建帝王颁发的诏、敕、诰、旨、上谕等,后者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封建帝王出于种种原因,常常大赦天下以示仁政,但历览古代大赦史,罕见赦及贪官污吏者。唐王朝是历史上下诏大赦最频繁的朝代之一,但都不赦赃官。唐太宗于贞观四年(630)颁布赦令,罪无轻重,包括死罪在内皆赦免,但赦令中特别申明:枉法受财之赃官不在赦列。“安史之乱”后唐由盛转衰,唐肃宗以天下未定颁布赦令:天下囚徒,凡死罪者减为流放,流放罪以下一律赦免,但亦申明官吏贪赃枉法者不在赦免之列。尔后文宗、宣宗、懿宗、僖宗等皇帝的大赦令中,均特申官吏犯赃不予赦免。宋王朝亦确定官吏贪赃为不赦之罪,还将赃官定为与“十恶杀人者”同罪。金世宗完颜雍也明确规定:“吏犯赃罪,虽令赦不叙。”古代一些统治者也重视人民群众对官吏的监督。如明朝在动员社会力量治理官员方面很有特色,《明史·刑法志》记载,“揭诸司犯法者于申明亭以示戒”。设立“申明亭”,将犯轻罪官吏的犯罪事实公之于众,以示惩戒。还允许民众将害民恶吏“绑缚赴京治罪”,各级官府“敢有阻拦者,全家族诛”。这些做法对贪官污吏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清代也曾颁发过“控烟令”

说起“控烟”，其实古已有之，仅清代就曾发布过多次“控烟令”。

烟草自明代传入中国以后，吸烟逐渐盛行，到清朝初期，吸烟者更为普遍。清廷入关后的前几位皇帝都曾努力恪守祖训，严格禁烟。但道光、咸丰年间以后，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衰落，“控烟令”也成了一纸空文，致使“烟民”剧增，“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走卒乞丐，莫不人口衔一支烟以鸣得意。”故此，人们将吸纸烟、吸鸦片、打麻将和嫖娼并列为晚清“四大公害”。

《大清律例》明确“控烟”

《大清律例》始编于顺治元年(1644)，历经顺治、康熙和雍正三朝，到乾隆年间重修，在经过乾隆皇帝御览鉴定后，正式“刊布中外，永远遵行”，形成清朝的基本法典。其中关于“控烟”做了明确规定：“凡紫禁城内及凡仓库、坛庙等处，文武官员吃(吸)烟者革职，旗下人枷号两个月，鞭一百。民人责四十板，流三千里。该管官员见而不行捕首被旁人捕首者，该管官员俱罚俸半年。又紫禁城内大臣侍

卫员吃烟者，派出看门护军查拿被获，除照例议罚外，照其官职加取一个月俸银给予拿获之护军。跟随人被获，除照例责打外，亦向伊等之主取一月俸银给与。如护军校不行拿获，革去护军校，不准折赎，鞭一百，枷号两个月。护军不行拿获，鞭一百，枷五个月。闲散执事之人照例鞭一百。”

按照这些规定，紫禁城里面是绝对不允许抽烟的。文武官员如果知法犯法，违令抽烟，则开除公职。此外，旗人要枷号(拘留)两个月，不仅要套上重枷站街示众，还要抽一百鞭子。普通百姓要挨四十大板，流放三千里之外。同时还有连带性处罚，也就是如果主管官员看见属下吸烟视而不见，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样要受处罚，扣罚半年俸禄。如此“控烟”，力度不可谓不大。一时间，吸烟者骤减。

康熙皇帝“控烟”从我做起

康熙“幼时在养母家颇善于吸烟”，成人后耳闻目睹了吸烟对百姓和国家的危害，所以当了皇帝之后，便“从我做起”，痛下决心

戒掉烟瘾。他在《庭训格言》中说：“……然朕非不会吃烟，幼时在养母家，颇善于吃烟，今禁人而已用之，将何以服人，因而永不用也。”他说到做到，从此再也没有吸过烟，同时诏令官吏军民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违者重罚。

史贻直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进士，官至詹事，有“丞相”之称。陈元龙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曾官至工部尚书。这两位甚好吸烟，且自恃功高，视“控烟”诏令于不顾，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是烟不离手，紫禁城内也不例外。康熙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决心破掉二人的恶习，以推进“控烟”诏令的广泛实行。

一次，康熙帝南巡江南，旨意史、陈二人陪驾前行。因皇帝在身边，两人不敢当着他的面儿抽烟。当行至山东曹州(今菏泽)暂住时，康熙皇帝当众赏赐两人各一根水晶杆烟袋，并谕旨二人当众吸烟。史、陈二人喜出望外，受宠若惊。谁知，他们吸烟时只要一用力，众人就会隔着透明的烟杆看到火星往上蹿，伴随着“噼啪”的炸响之声。在火星蹿到嘴边时，又会发出更加响亮的爆裂声。众人击掌大笑，前俯后仰。这时，二人才知道康熙皇帝的良苦用心：是用他俩当“反面教材”来以此为鉴，让大家懂得吸烟的危害。这次惩罚使他俩痛改恶习，从此与烟草一刀两断了。不少人一见皇帝的两位重臣都戒了烟，也不敢怠慢，纷纷扔掉了烟杆儿。

乾隆皇帝因患肺病传旨“禁烟”

乾隆皇帝酷爱吸烟，闲暇时常吞云吐雾，

即使上朝议政，也令太监携烟具侍候。曾有大臣几次奏请禁烟，乾隆均不置可否。

一年初冬的一天，乾隆刚刚起床，忽觉喉头奇痒难耐，忍不住一阵剧烈咳嗽，直咳得声音嘶哑、头晕目眩，上气不接下气。皇后见状，急忙上前为皇帝轻捶后背，然而无济于事，咳嗽愈加厉害。皇后恐有不测，急令太监直奔太医院。众太医闻讯，不敢怠慢，遂倾巢而来，给皇帝会诊。一位老御医为他把脉后微微叹道：“皇上咳嗽不止，微臣以为，病根在于吸烟过度。倘若不戒，恐于龙体大为不利。请皇上三思。”乾隆得知病因之后，方觉吸烟之害，于是命内侍不再安排他抽烟。过了一段时间，他的咳嗽也就不治而愈了。但没过多久，他的烟瘾上来了，又抽起了烟，可没过半个月，他又患了严重的咳嗽病。御医仍诊断为“是病在肺，遭厉者淡巴菰(烟草)也”。旧病复发使乾隆痛下决心，彻底戒了烟。因为戒了烟，再加上注意养生保健，他活了八十八岁，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他不仅自己戒烟，还传下“控烟”谕旨，令所有朝廷官员不准吸烟。据传，乾隆下了“控烟”谕旨之后，朝中官员纷纷将烟戒掉，但也有人私下里吸烟。于是，有人给乾隆皇帝打“小报告”，说仍有人在宫内吸烟。

一天傍晚，乾隆皇帝在养心殿处理完朝政后走出养心门，来到了军机处旁。但见侍卫值宿房的房门虚掩着，便走过去。他刚推开房门，一股浓浓的烟味儿扑面而来。走近一看，三个侍卫正每人捧着一个烟袋抽得正起劲

●史料钩沉●

儿。乾隆皇帝龙颜大怒：“胆大之徒，军机处值房重地，也敢施有烟火，戒烟之谕岂是一纸空文？！”三个侍卫一见圣上到此，连忙跪倒在地。乾隆皇帝依次夺下他们手中的烟袋，拂袖而去。

第二天早朝之上，乾隆皇帝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痛斥了军机处那三个在值房中吸烟的侍卫，并将“收缴”的三个烟袋予以展示。随即传旨：将那三个吸烟的侍卫革职，并予重答，流放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市），对疏于管理的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各罚俸禄半年。随后告诫百官，凡在禁宫内吸烟者将严惩不贷，从此再也没人敢在紫禁城内吸烟了。

慈禧太后也曾下令“控烟”

慈禧太后嗜好众多，抽烟是其中之一，在故宫博物院内至今还藏有她用过的水烟袋，此外，她对纸烟（卷烟）也很青睐。

清末时纸烟已在京城出现，《清稗类钞·吸卷烟》载：“卷烟为欧美运至之舶来品，亦有产于我国者。以纸裹于外也，故又曰‘纸烟’。以吸时有香也，故又曰‘香烟’。”因纸烟最初来自国外，所以被俗称为“洋烟”。由于纸烟制作成品低廉，比起传统的烟草，携带和吸食方便，香味浓郁，很快成为上层人士时髦和身价的标志，并以最短的时间“普及”到一般民众。在宫内，不仅后妃、太监、杂役吸食，连慈禧、光绪等也不例外。慈禧最喜欢吸的是一种叫“孔雀牌”的香烟，据说烟中添加了香料，所以抽起来很提神。

据传，有一次慈禧在颐和园里召见德国

公使夫人时，仍是烟不离手，一连吸了三根，还时而咳嗽几声。公使夫人被烟呛得直皱眉头，于是告诉她烟吸多了会“尼古丁”中毒，损害身体健康。慈禧不知“尼古丁”为何物，公使夫人便告诉她“尼古丁”是烟草中的一种毒素，长期吸烟能出现多种疾病，危害脑力，甚至危及生命。慈禧一听立马将吸了半截子的烟卷扔掉了，然后让李莲英将自己喜欢的“孔雀牌”香烟全部丢在昆明湖里。随后传旨：宫廷之内禁止太监、宫女吸纸烟，违者必罚。

老佛爷的“控烟令”一下，那些嗜好吸烟的太监、宫女连忙将自己的纸烟处理掉，因为她们知道老佛爷的脾气，一旦违反了她的旨意，轻者罚银、挨板子，重则被枷号、杖毙。一时间宫内是谈“烟”色变，就连最受宠的大太监李莲英也不敢怠慢，将老佛爷赐的三包“孔雀牌”香烟都扔了。

1905年6月27日《大公报》以“太后戒烟确闻”为题作了报道：“皇太后近日颇研究卫生要旨，以纸烟有害脑力，于日前将孔雀烟八箱，全行掷弃湖中，并戒在内廷服侍之内监及宫女等人，一概不准再吸纸烟。”一时间“老佛爷戒烟”成为京城里热议的“佳话”。

或许是因老佛爷“戒烟”之举，1907年初，学部议定禁止中小学学生吸烟，并通飭各省实施。1908年夏，学部再次发令，规定“年未及十六岁者，不得吸食各种烟卷”。此“控烟令”发出后，各界纷纷响应，由此出现了一个“控烟”高潮。



西安城门趣闻(十一)——尚武门

(西安城北面偏西门,位于西北三路北口)

1.尚武门位处唐嘉猷门

今尚武门位置恰在昔唐太极宫西宫墙嘉猷门处。

嘉猷门为太极宫西宫墙的偏北门,西通掖庭宫。掖庭宫位于宫城的西偏,遗址在今西安城西北隅,南起今西五台,北至自强西路以北,西至今西安西城墙,东至今西北三路,面积为1平方公里。掖庭宫内分为三部分,南部为宦官生活及其机构内侍省之处;中部为宫女居住区及犯罪官僚眷属妇女配没入宫劳动习艺之处,建有众艺台,为教艺之所;北部为太仓贮存米谷之处。太极宫西宫墙开

有二门,西墙偏南处为通明门,西墙偏北处为嘉猷门。今尚武门恰处在太极宫西宫墙嘉猷门处。

2.尚武门东近唐承庆殿

今尚武门内东侧,昔为唐长安太极宫承庆殿处。该殿位于太极宫中部西偏近宫墙处。建于隋,初称承乾殿。唐初,秦王李世民曾居此殿,并在此殿生有儿子,因殿之名,称为李承乾。武德五年(622)之后,秦王李世民始由此殿移居西内苑弘义宫。承庆殿后为皇帝在内廷处理政务和举行宴见之处。《新唐书·武平一传》载,中宗宴于两仪殿,令胡人唱合笙,

●西安风情●

武平一上书谏云：“两仪、承庆殿者，陛下受朝听讼之所，比大飨群臣，不容以倡优媠狎亏污邦典。若听政之暇，苟玩耳目，自当奏之后廷可也。”景龙二年(708)七月癸亥，中宗曾在此殿录囚徒；景云二年(711)九月丁酉，睿宗在此殿宴见过吐蕃使者。

3.尚武门内习武园

今尚武门，又称小北门，位于西安城西北隅，因门内原为清代习武园，故得名尚武门。

习武园，又称西武园，或北校场。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衙署志》：“习武园，即演武场，巡抚循例大阅之所，在万寿宫(址在今西北三路南口之西)西北。历科武闱乡试校士亦在此。科举停，遂专为校阅地。”说明这里是清代西安城平日训练与陕西巡抚于每年秋季降霜时节循例大阅绿营兵和考试武举人的地方。康熙四十二年(1703)圣祖皇帝西巡来西安，曾亲临此习武园校阅军队。康熙皇帝为此赋《长安行》诗云：“河山天险古金汤，都邑规模溯汉唐。陆海膏腴本沃壤，秦风懔悍称岩疆。每因眷念劳中夜，忍使时巡后一方。”“大阅三军训甲士，来朝诸部趋藩王。”旧址在今西安城西北隅尚武门之西仍称习武园处。

4.尚武门西广仁寺

在尚武门内之西，有一座西藏密宗黄教寺院，名广仁寺。该寺又称喇嘛寺，位于西安城西北隅，紧邻城墙，环境幽静，殿宇规整，是西安地区唯一的藏传佛教寺院。

广仁寺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

时圣祖皇帝西巡来西安，为了增进蒙藏满汉民族的凝聚力，巩固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下旨用西巡余款敕建，次年告竣。本寺为西北和康藏一带的喇嘛入京路过西安瞻礼和住宿之地，亦为达赖喇嘛和班禅活佛的行宫。寺院原规模宏大，丹楹碧甍，画栋雕梁，十分富丽堂皇。民国20年(1931)七月，寺侧火药库爆炸，石坊、山门、偏殿震毁，后经修复，“文革”中又遭破坏。现寺院整饰完好，占地十六亩四分，坐北向南。

大雄宝殿、藏经殿、讲经殿依南而北，位居中轴。东西两殿、配殿、跨院互相对称，全寺建筑共计一百余间。寺中有康熙皇帝御书“慈云西荫”匾额。1900年慈禧太后西逃西安期间，曾到广仁寺，并题匾“法相庄严”。1923年11月12日，康有为游览广仁寺时题匾“庄严佛土”。

该寺藏经殿保存有康熙四十五年(1706)复修明版汉文《大般若波罗密多经》6770卷及康熙三十九年(1700)刻本藏文《甘珠尔大藏经》108卷。在讲经堂前，有白色大理石莲花缸一个，石缸直径1.4米，缸口四周刻有隶书铭文，缸身遍布浮雕莲花绕枝图案，雕琢精美。寺中存鎏金铜佛像一尊，传为唐铸，自开元寺迁此。2006年9月29日，从西藏拉萨大昭寺经开光后迎回唐文成公主高90厘米、重50公斤的紫檀木雕像和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安放于广仁寺后殿。1983年广仁寺被公布为西安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汉阳陵博物馆

汉阳陵博物馆位于西安市北郊的渭河之畔,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依托西汉景帝与王皇后同茔异穴合葬的阳陵陵园而建,是一座巧妙融合现代科技与古代文明、历史文化与园林景观于一体的大型文化旅游景区,是中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博物馆。

汉阳陵始建于公元前 153 年,至公元前 126 年竣工,陵园占地面积 20 平方公里,修建时间长达 28 年。

汉景帝刘启(前 188—前 141 年)是西汉第四位皇帝,在位 17 年。执政期间,他崇奉“黄老之术”,轻徭薄赋,减笞去刑,和亲匈奴,与民休息,据史书记载,当时社会“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与其父汉文帝刘恒共同开创了我国封建社会早期治国安邦的黄金时代,被后世赞誉为“文景之治”,为其子汉武帝刘彻开疆拓土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1990 年 5 月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汉景帝阳陵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测绘、钻

探、发掘和研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发掘研究成果。阳陵陵园平面呈不规则葫芦形,东西长近 6 公里,南北宽 1 至 3 公里,面积约 12 平方公里。

经过 30 多年的考古勘探发掘,现已探明,汉阳陵主要由帝陵陵园、后陵陵园、南区从葬坑、北区从葬坑、礼制建筑、陪葬墓园、刑徒墓地以及阳陵邑等部分组成。帝陵坐西向东,被 81 条呈放射状的陪葬坑簇拥着,其四周则分布着后陵,南、北区从葬坑及礼制建筑遗址等;宽 110 米的司马道向东直通 5 公里之外的阳陵邑,司马道南北两侧整齐排列着王侯将相和文武百官的陪葬墓 10000 余座,一如当年天子临朝时大臣位列两班的威仪。陵区内 200 多座陪葬坑中出土的武士俑披坚执锐、严阵以待,仕女俑宽衣博带、美目流盼,众多的动物俑生动异常。可以说汉阳陵是中国封建帝王“事死如事生”丧葬观念空前盛行的真实体现,也是迄今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帝陵陵园,因而成为科学工作者研究汉代帝王陵寝制度和丧葬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美轮美奂的出土文物、独一无二的地下遗址博物馆、秀丽宜人的园林风光,使汉阳陵博物馆日益发展成为国内外独具魅力的大型文化旅游景区。



西 桃 园 村



西桃园村拆迁改造中

西桃园村形成于什么时候，现已无法考证。据传，到了清朝康乾年间，村里修建了北寺院后，便形成了“三巷两寺”的村落格局，一直到民国初年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关于西桃园村的姓氏，据传，变化还是很大的，有的姓氏人家，因无子继承祖业而断了香火，有的则因灾祸疾病等原因而绝门封户。相反，却另有一些新的姓氏人家搬迁到村里居住。就这样，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断有消失的姓氏，也不断有新来的姓氏，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对于当年聚合成村时的姓氏，现已不得而知。到临近解放时，西桃园村的姓氏，已形成家族的有林、夏、韩、李、杨、蒋、樊、史、陈等，一户单姓的有余、赵、任、蹇、冯、康、朱等共 16 个姓氏。

西桃园村的变迁从 19 世纪 20 年代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开始的，1926 年，西安发生了军阀之间争夺西安城的战争，西桃园村北寺院被驻扎在村里的军阀部队拆毁。这样一来，

西桃园村的村廓就变成了“三巷一寺院”。

抗日战争爆发后，虽然飞机场修到了西桃园村北门外，但只是占地、堵死了向北出村的通道，并未殃及到村体，而村落还保持着原来的廓貌，一直维持到西安解放。

1956 年，政府为了解决西安东南曲江地区的洪涝灾害问题，修建了一条由东南向西北、宽约 10 米左右的泄洪渠，穿村而过。这样，西桃园村就有 18 户人家需要搬迁让渠。当时，村里已经发展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于是，在政府的帮助下，农业社干部就在村西南的邻村旁边，划拨宅基地，安顿拆迁户，建起了西桃园新村，村里人叫“四队”。

穿村而过的泄洪渠修成之后，把西桃园村分成了南北两半。于是，施工单位就在西巷中间的渠面上架起了一座宽约 3 米左右的便桥，把南北两半连接起来，方便村民的出行和车辆通过。

1966 年，西安飞机场为了保证飞机的飞

行安全和周边群众的出行安全，对机场跑道进行拓宽、延长，并沿跑道两边修建安全防护围墙。西桃园村又有 32 户需要搬迁，包括西桃园小学所在的尼寺院都要全部拆除。另外，还有 10 户人家二次搬迁。这时候，村里已是人民公社体制，于是，在公社和生产大队的统一安排下，在村西边一里的地方，又建起了另一个新桃园村。西桃园小学也搬迁到村东边不远新建起一座简易学校。

这样，西桃园就由一个村发展成了两个村，继而又发展成为 3 个村。此后，就有了“老村”、“新村”的称谓。

经过几次变迁，此时的西桃园村，只剩下了早在 1958 年就拆掉了村门楼的西巷南半截以及东巷大半段和南巷子。从这以后的 10 多年间，南巷子先后搬进了 20 多户人家，使巷子向南延伸了 110 多米。西巷南门外的驿道上和原“大庙”山门前的地方，也都先后住上了人家。这样，西桃园村原来老村的模样就全变了。

到 1993 年，南二环公路要从西桃园村经过，本次老南巷北口几家在内的整个西桃园村和西桃园小学都要搬迁。

在政府的帮助指导下，村委会经过慎重研究，最后采取了村落整体南移、不离开老地方的方案，实施村落大搬迁。以村老南巷的西墙为界点，新修一条宽 12 米、长 260 多米、与老南巷平行的主干道。干道的北段接二环公路，南段与新修的活动小广场、露天大舞台相连。主干道的西侧，在与群贤路之间的夹角地

带，全部作为宅基地分配给搬迁户，由搬迁户按照村上的统一规划自行建造住宅房屋。这样，在这个地带，从北向南，就顺势形成了东西走向、宽四米、长短不一、平行排列的六道小巷组合的村民住宅区域。

整体南移的搬迁工作从 1993 年 6 月 2 日开始，到 1995 年前后基本完成，历时两年半左右。搬迁后，西桃园村便形成了后来的中轴主干道，东依老南巷、西托六道巷的村廓格局。

西桃园村小学搬迁到老南巷南边新建的校区。此间，两个桃园新村也相继拆迁，搬迁户一部分迁回了老村，另一部分住进了开发商修建的住宅大楼。

随着西安城市建设的深入发展，西桃园村委会为村民着想，提早安排，正在村老南巷北口对面、南二环公路的北侧，修建一座高 32 层的现代化商住大楼“桃园世纪大厦”。

解放以后，随着新农村的发展和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全村住家户和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特别是通过几次村落的迁变，使不少家庭改变了原来几家同住一院的家族式居住状况，这就使得老村的住家户数量变化很大。据统计，至 2011 年上半年，全村共有 488 户，1059 人，姓氏也增加了不少。如果再包括已迁出村、居住在村外住宅楼的户数和人口，则更多。

西桃园村的老村门楼上，镌刻着“樱园古地”四个大字。这是西桃园村的先民为后辈子孙留下的村志铭文，也是唯一仅有的遗

●我们的村落●

存文字。

村志铭，在通常情况下大多数都是记载这个地方的历史概况。所不同的是，西桃园村的村志铭没有详细的文字记述，而是以箴言式的“樱园古地”四字，来表述西桃园村这个地方的悠久历史和地表物华，以蕴含历史重地的深刻涵义。

近些年来，古城西安兴起的弘扬汉唐文化之风甚烈，特别是大唐西市和丰庆公园的建成，使人们对西桃园村这个地方已不陌生。从历史上来看，西桃园村这块地域非同一般，当年，这里确实有过一段非常辉煌的时期，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

史料显示，这个地方是当年唐长安城群贤坊的遗址。群贤坊，在长安城西隅，是名满大唐的长安城“西市”的西邻和大后院。由于毗邻西市，位置优越，使群贤坊成为当时长安城的名坊。

唐长安城“西市”，当年作为大唐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对盛唐时期国际商贸业的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史料载，当时的大唐西市是国内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商贸中心，商业贸易西至罗马，东到高丽、日本等国，全国各地的富豪巨商，包括来自中亚、波斯及西城的胡商，通过丝绸之路，从四面八方纷纷云集到这里，商海淘金。而近在咫尺的群贤坊，就成了这些往来商客旅居以及当朝达官显贵会聚的首选之地。

当时的群贤坊里，宅院会馆毗邻，亭台楼榭错落，园林树木成荫。大街小巷，人来车往，

常年一派繁荣。

然而，自从“安史之乱”后，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唐长安城遭受到巨大的劫难。西市及群贤坊也难幸免。房舍损毁，商贾难逃，客商断流，这里再也没有了几百年来的繁华，成了人烟稀少的荒芜之地。从此后，这块钟灵毓秀的物华宝地，在岁月的长河中，便以自然形成的村舍庄田，掩其历史重地之真面，静静等待着复兴重现之日。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历史的进程自然有道。当岁月年轮碾过千年坎坷，抵达 2011 年时，在当年群贤坊的遗址上，处处高楼林立，交通四通八达。丰庆公园和西安牡丹园的建成，使这里拥有了集商住与休闲为一体的优越环境，成为人们首选的宜居之地。从而，使沉寂了千年的群贤坊再现盛唐时期的人文繁华。

这是自然的巧合，仿佛历史在这里回归原点。

群贤坊，被西桃园村记载为“樱园古地”，是西桃园村人的故土家园。从当年聚舍成村时起，世世代代，历经漫长岁月，无论沧桑世道发生怎样的变化，西桃园村与这块“根”生死相依，始终不舍、不弃、不离。“桃园世纪大厦”竣工，但深植于故土的根却始终未动。

“樱园古地”对西桃园村有生息繁衍的天地之恩；西桃园村人根植“樱园古地”，有生死不离的眷恋深情和“人地情缘”。



东桃园社区改造后新建小区。图中1、2、3、4号楼为居民住宅楼,5号为商住两用楼,6、7号为商业用楼,小区占地面积约为40多亩。

东桃园村

位于南二环西段,东临劳动南路,西临桃园南路,北临大唐西市,与西北工业大学相邻。交通便利,四通八达。据本村老人讲述,在唐朝,村西有一专供皇上食用的桃园,当时的村民在桃园务工,故得名东桃园村,一直沿用至今。

1949年全国解放后,经过土地革命,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成立了东桃园村村委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于1966年变为原西安市郊区四季青公社东方红大队,1972年又划入西安市雁塔区丈八公社。东方红大队原有三个生产小队,两委会办公场所在村中间,是旧社会盖的一所小学。当时的西安飞机场与村子相邻,村子没有好的出行道路,村民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1978年,108户,432人。

按政府政策搞社会化大农业生产,实行一平二调(是指在新中国“人民公社”内部所

实行的平均主义的供给制、食堂制(一平),对生产队的劳力、财物无偿调拨(二调))。因此东方红大队将三个生产小队的三级核算变成了二级核算的一个大队,后又将一个大队按照自然居住情况分为三个生产小队,直至1980年。改革开放初期,第一生产队是最好的一个队。购置了一台28型拖拉机,给建筑工地拉石子、沙子搞副业,群众的一个劳动日十分工值一元。第三生产队在改革开放开始也办工厂,由于没有文化,不懂企业管理,无生产技术和销路,最后倒闭。

1985年前,全村都是土路,下雨后道路泥泞,仅靠一眼井维持全村人的吃水问题;住房全部为土胚房,有的还是解放前建盖的,遇到阴雨季节,每天白天和晚上时常听见有的村民房屋和院墙倒塌的声音。由于是粮棉队,村民经常没有菜吃,有个别人到附近的西关综

●我们的村落●

合队和草阳村、糜家桥偷人家地里的菜,大多数捡其他生产队的菜根和地里撒的菜叶子,直至1982年。由于村上集体经济收入和家庭生活条件差,姑娘大多嫁给周边的富裕村和城市居民,而本村的男青年只能找外省、外地的农村姑娘。当时外来的人总感到城边的农民生活很艰难,还不如远乡农村。

1978年,大队队委会看到有的村为发展经济办村办企业,也想摸着石头过河试一试。于是向信用社贷款,外聘技术员张荣轩抽调十几名村民进厂当工人,办起化工冷气厂,生产制造氯气。由于技术和设备的限制,加之不善经营和管理,经营十几年给集体欠债60多万元,最后倒闭。

1981年,第一生产队自筹资金成立东桃园锻造厂,主要经营锻件加工冶炼、翻砂、机械加工等,经过艰辛的创业过程,企业由小变大,逐渐形成一定规模。1984年,该厂扩建,经协商由大队接管,使企业上了一个新台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该企业法人最后选择了创办民营企业,由当时的村委会指派法人经营,1997年因环保政策及城市的发展停产歇业。1982年由于行政区域的划分,由原西安市雁塔区丈八公社划分到原西安市莲湖区潘家村公社。

1983年,第二生产队为了发展经济,请来了技师加工生产豆芽菜,生意越做越大,最后发展到家庭式生产,带动了全村村民发菜卖菜,成为西安市远近闻名的豆芽菜村。从1983年到2001年,经过18年的艰辛,村民由一贫如洗到手中几十万的存款,生活水平发生了

很大变化。

1990年,全村共有225户,745人。随着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耕地先后被西工大、南二环路、高新区的建设所征用。征地款部分集体留用,大部分分配村民。村委会利用留用的征地款,将全村的主要道路进行硬化,铺设自来水管,改变村民出行难和吃水难的问题;村民拆土房,盖平房,盖楼房,楼房盖了再加盖;从1996年起,村民有了自己的门面出租和房屋租赁,加之村上经济由1999年年均收入200万元到2007年年均575万元,2007年东桃园村民人均收入一万元。经济的发展使大家更加认识到了科学知识的重要性,村委会制定了相关的奖学制度,鼓励孩子上学。

2008年根据西安市的统一规划,恢复大唐西市遗址,该村实施整村拆迁。经过反复宣传和做思想工作,仅在半个月之内村民彻底搬完。进行就地安置,按照村民原宅基地面积,进行房屋置换,其他的作为房屋补偿;建34层高楼5座,用于村民居住安置,另建一座酒店和五层商业用房,总面积为53000平方米,用于今后村民长期生产生活。

2006年10月,根据城中村改造有关政策,全村村民转为城镇非农业户口。2009年成立了陕西东桃园实业有限公司,全村335户,1076名村民变为股民,按照政策要求,坚持“生不添、死不取、进不增、走不减”的原则,完成了上级要求的“农民变居民、村民变股民、村委会变社区、集体经济变为股份制合作经济”四个转变的任务。

栎阳镇卷子村背芯子



栎阳镇卷子村背芯子

◎ 富小云 整理

栎阳镇卷子村地处临潼区渭北平原,是栎阳北清河岸边一个古老的村庄。该村的背芯子是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起源于清朝道光年间(1821年左右),距今已有近 200 年的历史。

背芯子的制作过程是:先制作好木质或铁质的支架(芯子架),然后把装扮成各种戏剧人物的一名或者两名儿童表演者稳定在架子上,同时将芯子架捆绑在成人腰间。因铁支架如灯芯在内支撑,故称为“芯子”,一般一个芯子表现一个剧情或寓意。因为是由人背着表演,所以取名为背芯子。卷子村背芯子分“单芯子”和“双芯子”。一个人背一个儿童表演者为单芯子,一个人背两名儿童表演者为双芯子。演出的代表作品有:《黄鹤阵》《收三

肖》《广成子骂阵》《杀四门》等。其主要特点是:构思奇妙、装饰华美、设景布局惟妙惟肖。背芯子的成年演员一方面要保持平衡,不能让他上面的“芯子”掉下来,一方面还要和着鼓点进行类似秧歌一样的舞蹈,是一种力量与灵巧结合的美。

卷子村背芯子之所以留传至今,其真正原因还是它的形式及内容都受到老百姓的深深喜爱。背芯子不仅丰富了老百姓的业余文化生活,还给人们提供一种表达情感和愿望的平台。背芯子的产生、发展、传承可以很直接地反映当地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情感。

2011年10月,栎阳镇卷子村背芯子被列入西安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端午节的由来与传说

端午节是古老的传统节日，始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 2000 多年历史。端午节的由来与传说很多，这里仅介绍以下四种：

源于纪念屈原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是春秋时期楚怀王的大臣。他倡导举贤授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遭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对，屈原遭馋去职，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沅、湘流域。他在流放中，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篇，独具风貌，影响深远（因而，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公元前 278 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于五月五日，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身死，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位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地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仿效。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展成粽子。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

五，就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黄酒的风俗，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源于纪念伍子胥

端午节的第二个传说，在江浙一带流传很广，是纪念春秋时期（公元前 770—前 476）的伍子胥。伍子胥名员，楚国人，父兄均为楚王所杀，后来子胥弃暗投明，奔向吴国，助吴伐楚，五战而入楚都郢城。当时楚平王已死，子胥掘墓鞭尸三百，以报杀父兄之仇。吴王阖庐死后，其子夫差继位，吴军士气高昂，百战百胜，越国大败，越王勾践请和，夫差许之。子胥建议，应彻底消灭越国，夫差不听，吴国大宰，受越国贿赂，谗言陷害子胥，夫差信之，赐子胥宝剑，子胥以此死。子胥本为忠良，视死如归，在死前对邻舍人说：“我死后，将我眼睛挖出悬挂在吴京之东门上，以看越国军队入城灭吴。”便自刎而死，夫差闻言大怒，令取子胥之尸体装在皮革里于五月五日投入大江，因此相传端午节亦为纪念伍子胥之日。

源于纪念孝女曹娥

端午节的第三个传说，是为纪念东汉（公元 23—220 年）孝女曹娥救父投江。

曹娥是东汉上虞人，父亲溺于江中，数日不见尸体，当时孝女曹娥年仅十四岁，昼夜沿江号哭。过了十七天，在五月五日也投江，五日后抱出父尸。就此传为神话，继而相传至县府知事，令度尚为之立碑，让他的弟子邯郸淳

作诔辞颂扬。

孝女曹娥之墓，在今浙江绍兴，后传曹娥碑为晋王羲之所书。后人为纪念曹娥的孝节，在曹娥投江之处兴建曹娥庙，她所居住的村镇改名为曹娥镇，曹娥殉父之处定名为曹娥江。

源于古越民族图腾祭

近代大量出土文物和考古研究证实：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有一种几何印纹陶为特征的文化遗存。该遗存的族属，据专家推断是一个崇拜龙的图腾的部族——史称百越族。出土陶器上的纹饰和历史传说说明，他们有断发文身的习俗，生活于水乡，自比是龙的子孙。其生产工具，大量的还是石器，也有铲、凿等小件的青铜器。作为生活用品的坛坛罐罐中，烧煮食物的印纹陶鼎是他们所特有的，是他们族群的标志之一。直到秦汉时代尚有百越人，端午节就是他们创立用于祭祖的节日。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大部分百越人已经融合到汉族中去了，其余部分则演变为南方许多少数民族，因此，端午节成了全中华民族的节日。



汉代的“麟趾金”

在中国货币发展历史上，黄金的使用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早在遥远的殷商时期，先人已知用金，但中国古代黄金主要是用作贮藏和大量支付手段。

提起古代的黄金货币，一般读者马上就会联想到“金元宝”、“金条”、“金锭”等名词。可是，在 2000 多年前的西汉时期，人们往往将黄金做成圆形的金饼形状，俗称为“麟趾金”。西汉盛行黄金，以斤为计算单位。黄金的形式受到楚国的影响，形状通常为饼状，又有柿子金、马蹄金、麟趾金等形式。

为什么古人要把黄金做成麟趾形状呢？这得从麒麟说起。

麒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祥瑞的象征，在民间有“瑞兽”之称，同时还在“麟、龙、凤、龟”中居于“四灵之首”，自古以来就有“盛世出麒麟”的说法。

麒麟其实是古人对一种集合鹿、马、牛、羊、狼等长毛动物的模糊称谓。其形象是羊头、鹿身、马足、狼蹄、牛尾，耸一只或一对鹿角。古人认为麒麟文质彬彬，一举一动都讲究姿容仪表；认为麒麟品行高雅，不会去伤害其它动植物。而且，麒麟还是罕见的一种长寿动物，少则活一千年，多则长达三千岁。麒麟同龙凤一样，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符号之一，寄托着古人对仁道德政、对贤明君主、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赞美。

因为麒麟稀有珍贵，又能示吉祥、兆祥瑞，帝王们就用金玉做成麒麟形状，用以馈赠亲属，奖赏部下。于是，人

●文史拾趣●

们佩戴玉麒麟，就有了显示身份和荣耀的意思。宋代诗人陆游有诗云：“同舍事容悦，腰佩玉麒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被称作“麟趾”的金币的用途亦是如此。“麟趾”的字面意思就是麒麟的足脚。《诗经》言“麟之趾，振振公子；麟之定，振振公姓”云云。意思是周文王的子孙都能像麒麟的脚步那样，该行则行，该止则止，以善德行世，从不做有犯周礼的事情。此后，“麟趾”便成为颂扬王室子弟德行佳好的专用词汇。后世常以“麟趾呈祥”作为结婚、喜联的横额，祝福生育仁厚的后代。

汉代铸造“麟趾金”始于西汉太始二年（前95），这年春天汉武帝出门转游了一圈，回长安后颁布了一道诏书，称自己登西陇高原曾经喜获白麟，又在渥洼水边见到了天马，在

泰山见到了黄金。所以，当时人们根据这三件事，欲表祥瑞，就铸造了一批“麟趾”形状的金币。从此，汉代便有了以“麟趾”为名的金币。“麟趾金”主要用来赏赐那些效忠于皇室、有军功的大臣。因为不是铸币，根据交易的需要，在使用时可以任意切割，故“麟趾金”仍处在比较原始的称量货币阶段。

钱币博物馆展出了一枚“麟趾金”，正面为圆形，背面中空，周壁向上斜收，口小底大，形如圆足兽蹄。这枚金币含金量95%，最大直径处6.5厘米，高5厘米，壁厚1.5厘米，重286.97克。

汉代“麟趾金”铸造精良，造型优美，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沧桑仍然保存完整。

·解字·

卯

①

②

③

④

“丁卯毋相杂。”这个“卯”字本为象形字。①是甲骨文的形体。吴其昌认为：“卯之始义，为双刀对植之形。”“刘”字的繁体字“劉”的左上部分就是“卯”。《尔雅·释诂》：“刘，杀也。”再者，古音“卯”与“刘”同部，“卯”字的本义亦应为“杀”。②是金文的形体。③为小篆的形体，与甲、金文相似。④为楷体的写法。

可见“卯”字的古今形体是一脉相承的。《说文》：“卯，冒也。二月，万物冒地而出，象开门之形，故二月为天门。”这是牵强附会的说法，不足信。“卯”字在甲骨卜辞中经常有卯几牢、卯几牛、卯几羊的说法，这是用牲之名，杀牲祭祖祭天等。所以“卯”字的本义应为“杀”。后来本义消失，被假借为地支的第四位，也是十二时辰之一，故“卯时”即上午五时至七时。因为这个时间为旧时官署开始办公的时间，所以上班点名，也称为“点卯”“画卯”。早晨喝的酒，古时亦叫“卯酒”，如白居易《醉吟》：“心头卯酒未消时。”也就是说：心头的晨酒还没有消呢。

百年前中国人怎么炒股

百年前的股市就可以说是十分疯狂：炒股者从不问公司业绩的好坏，买橡胶股却不知橡胶为何物，更遑论什么金融常识、政策跟踪，造成了畸形的股票交易市场，导致了早期的中国证券市场的四次大崩盘。

不问公司业绩

在中国，股票市场出现在现代银行之前，早在 19 世纪 60 年代，洋行股票就开始在上海问世。之后，在中国洋务运动的驱动下，第一只华商股票——轮船招商局——于 1872 年底开始交易。

接下来，江南制造局、开平煤矿等现代工业企业、矿业企业相继发行股票。1881 年，外国商人创办了上海自来水公司，其股票供不应求。同年，原本乏人问津的轮船招商局股票价格也开始上涨，100 万两的额定资本全部招足，而原本的 100 两一股也在 1882 年时达到了 260 两的高位。

正如 1882 年 9 月 2 日的《申报》所评论的：“今华人之购股票者，则不问该公司之美恶，及可以获利与否，但有一公司新创、纠集股份，则无论如何，竞往附股。”就是说根本不

管你公司是干什么的，是蒸蒸日上还是面临倒闭，总之你敢发我就敢买。于是大起大落的刺激来了。

1883 年 10 月，对矿业股票的过分投机导致中国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危机。当时，矿业股票暴跌，形同废纸，其他原本信誉良好的招商局、开平矿务局股票也是一落千丈。于是股市崩盘，股民血本无归，纷纷上天台思考人生。介入股票投机和承做股票抵押的钱庄也纷纷倒闭，一度空前繁荣的股票市场变成了夜晚的菜市场——热闹过后一片狼藉。

不知所买为何

夜晚的菜市场虽然冷清，但到了第二天，就又恢复了喧嚣。晚清的股票市场也是，经过十几年的时间，人们逐渐淡忘了那次惨痛的金融课，股票交易市场随着国外资本的注入和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再次繁盛起来。然而，在 1910 年爆发的橡皮股票风潮，让早期的中国股民再次体验到股票不可爱的一面。

所谓橡皮，是当时上海人对橡胶的称呼。1903 年，英国人麦边在上海组织了一家蓝格

●文史拾趣●

志(橡胶产地名)拓殖公司,吹嘘其经营范围包括开辟橡胶园、挖石油、采伐木材等,然后开始招股,但虚假宣传了五六年却没什么业务。到1909年,因为世界性的橡胶涨价,外国开发成功的橡胶园企业主和投资人大大获其利,于是购买橡皮股票的中国人逐渐增加。就像商场大减价一样,甭管卖什么,总会有人一窝蜂围上去,于是人人争先,个个奋勇,不甘落后。麦边和其他橡胶公司就利用这一时机疯狂抬价,由原本约60两的股面值抬升到1450余两。然后一众冒险家佯言回国,一去不回,股票价值遂一落千丈,后面的情节和第一次一样。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媒体是这样批评此事的,说“可异者市中尚有不知橡皮为何物者”,就是说很多炒股的人根本连什么是橡胶都不知道,照样炒,而且是“投出多年的积蓄尚且不以为足,进而变卖家人的衣装、首饰等物,竞相购买橡胶股票”。

信交风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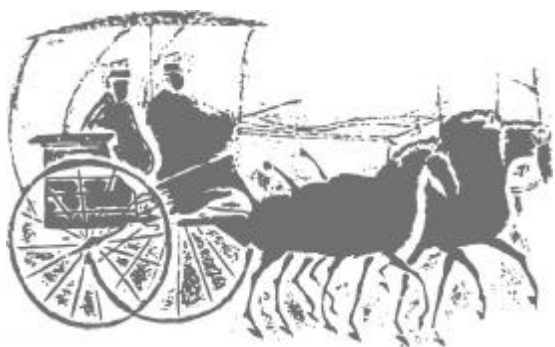
第三次是在1921年,当时在北平和上海都成立了股票交易所。尤其是1920年7月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仅半年间,就盈利20万元,从事证券买卖的股东、掮客、经纪人都获利甚丰,这让人们以为开交易所赚钱容易,是发家致富奔小康的捷径,于是,交易所、信托公司就变得很多。到1921年9月,上海有交易所70家,其后开交易所更是像开淘宝店一样容易,11月份上海就新增38家。当时人描述说,“报纸广告栏中,几日间有一交

易所出现,十日内必有一信托公司发生”。其他国内各大商埠,如北平、天津、汉口,也纷纷步上海之后尘。

当时在交易所,布、麻、煤油、火柴、木材、麻袋、烟、酒、沙土、水泥,什么都可以交易,市场一片兴旺。但是,一来做物品买卖中介佣金利润不高,二来可流通的物品和有价证券相对有限。所以,有的交易所开始将本所的股票作为交易筹码进行买卖。交易所、信托公司相互利用,哄抬股价。加上一战结束,外资再次涌入,和国内游资一道,不问缘由,盲目跟风,一起进入股票交易市场,没人去做实业。由于市面资金短缺,1921年9月,银钱业从资金安全考虑,开始紧缩银根,收回贷款,投机者措手不及,破产者十之八九。然后,连锁反应开始,和前两次一样。

民国时期的最后疯狂

1945年,因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被查封停业,证券交易转入黑市,国民党政府看难以取缔,于是转而对证券市场加以控制和利用。1946年9月16日,南京政府指定杜月笙牵头筹建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11月以后,日成交量达到80000多万股。到1947年,上市股票增加到32只,总市值达70783亿元。然而,因为国民党统治下通货恶性膨胀,导致经济全面崩溃,股票市场也不能独善其身,经历短暂繁荣后,开始迅速衰退,之后一系列行政政策,更是导致股票价格全面暴跌。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证券交易所停业。



说说古代的“公车”消费

自古以来，公车对官员们来说，既是代步的工具，更是身份和排场的象征。历朝历代不同级别的官员所乘车的类别和档次是不一样的。

“马车”“牛车”曾盛行一时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王公贵族们都以乘坐“马车”为荣。西汉建立时，由于连年战争的原因，马匹奇缺，汉高祖刘邦出行都找不到四匹毛色相同的马拉车，一些官员屈尊乘“牛车”。到了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认为，国家初建，百废待兴，在公车使用上也应该节俭，所以费用相对低廉的“牛车”再次盛行，直到经济恢复后牛车才又被马车取代。南北朝时期，皇帝和大臣们注重追求个性化，比如南朝的宋文帝喜欢乘坐几只羊拉的“羊车”，大将军沈庆之经常乘坐一种叫“猪鼻无帷车”的怪异公车，这些都被认为是时髦的表现。

“轿子”日趋普及

唐宋时期，“轿子”作为公车逐渐普及，光是皇帝坐的轿子就分为多种：上朝时乘坐的叫礼舆，在紫禁城内巡视时乘坐的叫步舆，去

城外巡狩、视察民情乘坐的叫轻步舆。除皇帝的轿子外不同品级的官员也乘坐不同的轿子。而且官轿出府常有随从在前鸣锣开道，轿旁还有侍卫人员前呼后拥好不威风！百姓见之必须肃静回避甚至跪拜。官越大，抬轿的人越多。一般七品官多为四抬，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乘八抬，皇帝出宫时是十六抬，自然是最高的规格。

“坐轿”制度的更迭与兴废

然而官员最初一般是没有坐轿资格的。唐代初年，就连官职最高的宰相出门也一律乘马，只有贵族妇女才可乘轿。唐武宗时期有所松动：三品以上的宰相、三公、尚书令以及退休和患病的官员才可乘轿，其余不论尊卑，一律不准，而且坐轿者还必须自己出钱雇。北宋时期，士大夫阶层认为乘轿是“以人代畜”，有伤风化，所以都不乘轿。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禁京师人士舆轿”，只有司马光是四朝元老，德高望重，哲宗念他年事已高，批准他乘轿上朝，但司马光一再辞谢，不敢接受。

·文史拾趣·

而创建明朝的朱元璋担心养尊处优的轿子代步会导致吏治腐败，因此开国不久便规定只许妇女和年老有病者乘轿。这一规定在明朝初期执行得非常不错，但是，随着明朝的日渐衰弱，监管也每况愈下，一些贪恋安逸的官员们又纷纷坐上了轿子。

清朝和明朝类似，统治者对保持满人擅长骑射的优势非常重视，特别规定满族在京官员不分文武一律乘马，一品文官如果因为年老或疾病不能乘马的，必须经过特许才可乘轿。而汉族文官皆许乘轿。不过，从《清朝文献通考》的记载来看，满族官员不许乘轿的禁令在康熙时就被突破，到乾隆时乘轿已成普遍现象，皇帝为此连发诏谕训斥，但是仅靠

三令五申是没有效果的。比如大将军福康安，他作为乾隆的宠臣，长年统兵，“其出师督阵亦坐轿，须用轿夫三十六名，轮替值役，轿行如飞”。

总体上看，历代政府关于官员公车使用的规章制度总是在前紧后松的周期性轮回中被不断突破，公车的日益舒适化和奢侈化往往是一个朝代走向衰亡的前兆。如何有效限制官车的消极作用，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政府面临的严峻问题。如何标本兼治地解决公私不分、公车消费负担过重的问题，的确值得耐心思量。这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名句欣赏·

【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举事以自为者，众去之】——《淮南子·兵略训》

自为：为自己。去：离开。

【奉公如法，则上下平】——《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奉公：奉行公事。如法：遵从法律。

【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

【为国忘私仇，千秋思廉蔺】——(清)严允肇《古风》

私：偏爱。

【国耳忘家，公耳忘私】——《汉书·贾谊传》

耳：而。

省志办主任王锦春一行 到西安市志办调研

围绕“深化改革,破解地方志工作中的难题”,着力推进第二轮市志编纂工作,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王锦春等一行3人,赴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开展调研。

6月16日上午,市委常委、副市长吴义勤,市政府副秘书长周爱全与省志办王锦春主任就我市地方志工作进行了交流。随后,王主任一行看望了市地方志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视察了西安地情网站,查看了市地方志办公室近年来出版的书籍成果,并与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了座谈,听取了市地方志办公室对单位的基本情况和调研有关情况的汇报。

王主任对我市地方志工作给予了充分肯

定。他说,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是在年鉴编纂、地情资料开发、旧志整理等方面成果丰硕,给全省地方志工作树立了标杆;市地方志办公室领导班子团结有力,干部队伍素质高,综合业务能力强。谈到我市地方志工作今后发展时,王主任指出:一是要进一步贯彻全国、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把“一纳入八到位”真正落到实处;二是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打好二轮修志攻坚战;三是要继续探索,为全省、全国地方志工作提供好的经验;四是要发挥文化、历史优势,编出更多更好的成果;五是要实现年鉴的全覆盖,保证区县地方志工作的持续发展。

省地方志办公室王锦春一行 调研长安区地方志工作

6月16日下午,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锦春,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冯艳阳、副主任张帆一行冒雨来长安调研地方志工作。区长杨建强、区委副书记王福林同志分别参加座谈交流和调研活动。

王锦春主任一行参观了长安展厅,到区地方志办公室看望慰问地方志工作者,并召开座谈会,全面了解长安第二轮区志编纂进

度、年鉴编纂、地情网站建设、地域文化研究和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等工作。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建都从长安基本区情、区地方志办机构设置,工作现状、取得的成就、工作经验、存在的不足和建议等方面汇报了长安区志工作进展情况;各位区志编辑就自身工作实际,敞开心扉地交流了对未来地方志工作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通过实地考察和听取汇报,省、市方志办领导对长安区地方志机构建设,人员、经费保障,二轮修志、年鉴编纂、地情网建设、乡村史志工作等给予了充分肯定,并高度赞扬了长安区在编纂二轮区志中形成的“长安模式”,即工作善于创新、统筹协调、借力使力、区志审核关口前移等。

王锦春主任强调,地方志工作有着存史、

资政、育人等十分重要的作用,地方志工作者要有甘坐冷板凳的心态。一是要修好志书,始终坚持质量第一;二是年鉴工作要下一步要实现全覆盖,做到一年一鉴;三是要加强乡村史志工作指导,统一规范标准;四是要加强地情资料丛书和地情网站建设;五是要积极争取,在理顺区级地方志工作体制和机构设置方面给全省带个头。
(蒲满庆)

《西安市志·自然地理资源分志》 评审会召开

4月28日,《西安市志·自然地理资源分志》评审会在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召开。邀请了市国土资源局、市农委、市林业局、市水务局、市气象局等相关单位,以及省、市、区县地方志有关专家顾问参会并做评审。参加本次评审会的人员还有市志处处长杨军亚、陕西师范大学志稿编纂组成员及相关人员近20人参加。会议由张帜副主任主持,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冯艳阳作了重要讲话。

会上,首先由分志承包方陕西师范大学环境旅游学院岳大鹏教授介绍《自然地理资源分志》编纂情况;评审们先后作了精彩的评审发言,从志稿的结构层次、内容的真实性、数据准确性等方面提出了精辟到位的修改意见。与此同时,对志稿的总体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评审一致认为:该志稿篇目构架基本合理、内容全面充实,尤其增加了大量图表,设计新颖,丰富了记述内容,行文基本规范,全面记述了自然环境、自然资源、自然灾害等二

十年来的发展变化情况。从各方面看均已比较成熟,建议通过评审。

冯艳阳主任作总结讲话,她首先对评审会的成功召开表示祝贺,对各位专家评审在会前精心审读、提出书面修改意见,又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表示衷心的感谢!

她说,《西安市志·自然地理资源分志》因涉及内容广泛,专业性较强,为了更准确、详尽、高质量的编纂好《自然地理资源分志》,经研究将其承包给陕西师范大学环境旅游学院编纂,这种方式今天看来是一种很好的尝试。根据专家评审给出的意见,宣布《西安市志·自然地理资源分志》通过评审。

她强调,这次评审通过并不意味着志稿完成,而是进入更高的阶段。会议后请承包方认真吸取和采纳各位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做好志稿的修改,大家携手力争把《自然环境资源分志》编纂成精品佳作。

《长安志·长安志图》校点本 获陕西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一等奖

在 2015 年度陕西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选中,由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主持完成的《长安志·长安志图》校点本,从众多参评优秀成果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

《长安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都志,北宋熙宁九年(1076)宋敏求撰,20 卷。除备述唐长安城坊及宫室、第宅、寺观外,还上溯周、秦,旁及京兆府所属万年、长安等二十四县,详记其沿革、山川、名胜、古迹;《长安志图》,历史地图集,元李好文编撰,三卷。上卷为汉唐城市官坊等图,次卷为古迹陵墓,末卷为《泾渠图说》。其中图志杂说十八篇为作者自



撰,考证详明。为后世研究唐及唐以前长安的历史、地理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长安志·长安志图》校点本,由阎琦、李福标和姚敏杰共同完成,陕西出版传媒集团三秦出版社于 2013 年出版发行。

我办姚敏杰副主任参加中国版协 第十五期年鉴编纂高级研讨班并作专题讲课

2015 年 6 月 23—26 日,中国版协年鉴工作委员会主办的全国第十五期年鉴编纂高级研讨班在广西北海开班。此次研讨班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280 余位年鉴界领导、编辑、撰稿人员参加。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姚敏杰带领市志办、市政府政研室、贸促会、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编辑、撰稿人员一行 5 人参加了研讨班。

研讨班采取专家授课、教学互动、座谈讨论等形式。我办姚敏杰副主任作为中国版协

年鉴工委副主任,与年鉴工委的主要领导许家康、王守亚、莫秀吉、王中华、朱敏彦、张恒彬、谭惠全出席开班式,并以《年鉴文法与修辞》为题,作专题讲课。分别从年鉴文法与修辞问题的提出、年鉴文法及其特点、年鉴修辞及其特点等方面,对年鉴文法与修辞进行挖掘。讲课内容既有理论深度,又联系当前年鉴工作实际。讲课方法灵活,以大量的事例进行佐证,并辅助多媒体课件,方便学员记录,受到与会专家和学员的一致好评。

古时说发型多半是在谈年龄

“髻”容易和“髻”弄混。前者专门用于孩童,而且是用来形容头发下垂的样子;而后者主要用于“发髻”,指盘在头顶或脑后的发结。清代袁枚《祭妹文》中“汝梳双髻”,指的就是妹妹头上梳着两个发结。清代戴名世《姚符御诗序》中“与余垂髻相识,稍长,各游学四方”,说的便是小时候就相识了,等长大一些,便各自游学。其实“召”和“吉”用于发声,根据读音便不会将这两个字写错。

很多古人对年龄的称呼,都与头发有关。除了垂髻外,还有总角、束发、弱冠、及笄、黄发等。

古时孩童,把头发中分,在头的两侧束成

两结。因为形状像牛角,所以叫总角,指的是八九岁到十三四岁。后来人们也用“总角之交”来形容幼年时代就交好的朋友。束发是把总角解散,束成以髻。这时已是成童。开始束发的年龄大约为十五岁,在古代是入大学之年。弱冠指的是古时男子年二十行成人礼,结发戴冠。因此时身体还不够强壮,故称弱冠。及笄是女孩子的成年礼,大约到了十五岁,女孩子就会把头发束起来,佩戴上笄(也就是发簪),表示自己已经成年,可以许配人家。黄发则是用来形容长寿的老人。古人认为老人发白,白久则黄,因此黄发是长寿的标志。

立夏为什么要吃蛋呢?

一种说法是,古人认为,鸡蛋溜圆,象征生活圆满,立夏日吃鸡蛋能祈祷夏日平安。“立夏吃了蛋,热天不疰夏”,很多地方都有吃“立夏蛋”的习俗,是说立夏吃蛋能预防暑天常见的食欲不振、身倦肢软、消瘦等苦夏症状。

也有一种说法:立夏吃东西最补,吃一枚鸡蛋相当于吃一只鸡。立夏后,农事开始繁忙起来,人容易疲乏。吃红枣鸡蛋,是为了补充体力。

这个说法,倒是和中医理论契合。中医认为,鸡蛋性平、补气虚,有安神养心的功能,生病吃鸡蛋可以帮助恢复体力。以前生活条件不太好的时候,红枣鸡蛋很难吃到,吃一个立夏蛋,既是辛苦劳作前的犒赏,也是对平安和丰收的企盼。

由于鸡蛋不伤脾胃,一般人都适合,

所以哪怕是有高血压等慢性病的人,立夏吃鸡蛋也是有益健康的。

而鸭蛋性凉,能滋阴清肺,适宜阴虚火旺者食用,适用于病后体虚、燥热咳嗽、咽干喉痛、高血压、腹泻痢疾等病。如果是日常活动量较大且无高血压等慢性病的年轻人,可以尝试一下咸鸭蛋,只要不是吃起来很咸,则既可清热,又助补充盐分等矿物质。

在嘉兴地区,立夏蛋里也有咸鸭蛋的身影。搞养殖的人知道,开春后的鸭产的蛋品质最好,是制作咸蛋的上佳材料。立夏时节的咸鸭蛋都是在清明前腌制,到一个月后的立夏正好食用,是一年中的头谱(注:方言)咸蛋。第一批咸鸭蛋是在立夏吃的,这跟端午节的咸鸭蛋意义不一样。



八路军 番号由来

1937年9月6日，陕西三原县石桥镇村外的田野上临时搭起了阅兵台，我9000多名红军将士在这里誓师出征，番号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第129师”。三原誓师后，129师和先前整编的115师、120师一样直接开赴抗日前线。一个月后，国民政府宣布南方各省（琼崖除外）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然而，八路军、新四军番号的由来却颇费周折。

西安事变结束了10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周恩来等赴西安，同国民党就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问题进行谈判，提出：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组成一路军，设总指挥部，配正副总司令，下辖4个军、12个师、36个旅、108个团，军官由延安派。而国民党只给2个

师、8个团的编制，不设军和总指挥部，除师长外其他军官由南京配备，直属国民党军政委员会领导。双方围绕人员编制和领导权问题僵持不下。此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只要蒋介石同意改编红军就是我们的一大胜利。”中共再作让步。3月8日，谈判达成5条意见，上报蒋介石审批。其主要内容是：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及蒋介石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按国军同等待遇。编为3个师，计6个旅12个团及直属队共4.5万人。设总指挥部，干部由中共推选。史称“三八协议”。但没想到这个由蒋介石指导下产生的协议，蒋又反悔不同意了，谈判又回到了起点。

就在国共谈判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卢沟桥事变爆发了。第二天，中共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当日，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请缨杀敌，“誓与日寇决一死战”。7月17日，周恩来到庐山同蒋介石举行第4次会谈。由于蒋介石幻想日本人不扩大事态和再次媾和，谈判无果。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再三权衡后，终于放弃了“收编”的企图，国共会谈出现了转机。蒋介石在调动国军淞沪会战的同时，同意“三八协议”。红军整编后的番号是桂系空出的八路军，3个师的番号则是吃败仗被撤销的东北军115、120、129师。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宣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设总指挥部，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115师师长林彪，120师师长贺龙，129师师长刘伯承，全军编制4.5万人。为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立前方军委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书记。

西安第一家正规电影院

——阿房宫电影院

◎ 封五昌

阿房宫电影院是古城西安最早兴建的一家正规电影院。

1931年冬，陕西最早从事电影艺术工作的周伯勋(1911~1987,临潼人),从上海回到西安,深感西北文化闭塞落后,打算在西安开设一家电影院,以满足西安民众文化娱乐生活的需要。首先,周伯勋同戏剧界好友封至模、武少文谈及此事,三人一拍即合。后来,他们又约请了文化艺术界几位名流刘尚达、张子泉、马公弢等人共同商议,得到大家一致赞同后,周伯勋就请他父亲周凤岗出面具体操办,由封至模负责筹资。周凤岗也早有此意,就将自家位于竹笆市北口路东的私宅作为院址,并以秦代著名宫殿“阿房宫”命名之。

阿房宫电影院为股份有限公司,入股的各界人士都有。其中,武少文入股较多,即由他任经理,封至模任股东代表,周伯勋担任在上海联系影片的任务,影院筹备事宜当年顺利完成。

1932年春,从上海聘请的放映人员和发电工人到达西安。6月19日,在一片欢腾声中,西安第一家新型电影院——阿房宫电影院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影院门面设计为半宫殿式,大门两边竖起两根朱红大柱,上面盘着两条金龙,龙口含着明珠(镶进灯泡),门脑安装一颗大型“彩珠”(实为灯泡),形成双

龙绕柱腾空戏珠的壮观势态,不仅白天好看,入夜龙口灯光灿烂,更为夺目,放映厅内布局新颖,座位舒适(当时有600多席),分楼上楼下,票价一律二角五分。开幕式后,放映了新由上海采购的《故都春梦》《野草闲花》《恋爱与义务》三部影片。电影初放,轰动古都西安全城,市民们大开眼界,奔走相告。值得一提的是,由封至模先生设计的影片“说明书”尤有特色,不仅有内容简介、演职员表、电影插曲,而且印刷精美。1983年,上海举行著名电影艺术家孙瑜同志从影50周年纪念活动的资料展览中,还展出了多份当时阿房宫电影院的“说明书”。

由于“阿房宫”是西安市第一家电影院,片源较充足,加之宣传得法,故而上座率很高。每日三场,晚9时散场,几乎场场满座。因此,很多人争相仿效。于是,在西安市南院门、马坊门、尚仁路(今解放路)等处,相继出现了好几家电影院,除民光(1933年创建,创始人于孝先)、宝珠(1946年建院,后改名“星光”)外,尚有明星、西京、陪都、银汉、新民等院。然而,在那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它们大多经营时间较短,比如“银汉”开业仅5个月就关门大吉,只是昙花一现罢了。从1932年创业伊始,经历了80多个春秋,直至今日,仍照常营业者,阿房宫电影院是仅存的一家。



曲江三章，章五句

◎ (唐)杜甫

曲江萧条秋气高，菱荷枯折随波涛，游子空嗟垂二毛。
白石素沙亦相荡，哀鸿独叫求其曹。
即事非今亦非古，长歌激越捎林莽，比屋豪华固难数。
吾人甘作心似灰，弟侄何伤泪如雨。
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往南山边。
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

作品赏析

第一章诗人借曲江秋季萧瑟，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的寂寞和忧伤。首句“曲江萧条秋气高”，写诗人秋游曲江，曲江一派萧条冷落景象。次句“菱荷枯折随风涛”，写秋风瑟瑟，菱荷残枝败叶在水面随风不停摇曳。诗人缘情写景，因而景随情迁。诗中以景起兴，曲江秋气感人，诗人不免有年衰之叹。第三句“游子

空嗟垂二毛”，写诗人宦旅京华，郁郁不得志，年纪将老而功名无成，面临秋色寂寥的曲江，诗人感慨万千。游子，杜甫自称。二毛，指头发有黑白二色。末二句“白石素沙亦自荡，哀鸿独叫求其曹”写曲江水下白石、素沙，在流水中摇荡不定；孤独的鸿雁悲哀鸣叫，仿佛是在寻求它的伴侣。诗中以此作比，暗喻诗人落魄孤零之况，烘托了诗人失意寂寞的心情。

● 历代诗人咏长安

第二章写诗人放歌解忧。语似旷达，实为悲愤之词。首句“即事非今亦非古”，诗人根据眼前情事即兴吟咏，此诗以五句成篇，似为古体诗；而以七言成句，又似今体诗。这种七言五句的格式，系杜甫自创体，所以说“非今亦非古”。次句“长歌激越捎林莽”，长歌指此诗三章相连，“连章迭歌”；诗人引吭高歌，声动草木，“足以一抒胸臆”。（《杜诗详注》）第三句“比屋豪华固难数”，曲江一带豪华宅第，难以胜数。这一句措词平淡，却意味深长，写景中隐隐流露出一种忧愤之感。末二句“吾人甘作心似灰，弟侄何伤泪如雨”。《庄子·庚桑楚》：“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矣。”杜甫化用以表达自己愤懑不平的心情，说“甘作”正表明诗人并未“心似灰”，实质上仍是不甘心。诗人奉劝弟侄不必为他仕途失意而伤心流泪。诗人满腹忧情，却以劝慰他人之语写出，语似达观，更显凄楚悲愤。

第三章写诗人仕途无望，意欲归隐，抒发了内心的愤懑心情。首句“自断此生休问天”，诗人怀才不遇，认为此生仕途无望，不必去问

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往南山边。”杜曲，在长安城南，杜氏世居于此。南山，终南山。杜曲在终南山北麓。杜甫有诗说：“南山豆苗早荒秽。”（《投简咸华两县诸子》）两句写诗人打算回祖籍隐居度晚年。曲江宅第豪华，却非故园。诗人意欲归隐，隐含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和浓重的思乡愁怀。末两句“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写诗人欲学汉朝名将李广射虎于南山，以终残年。清人张上若评论说：“看射猛虎，意在除奸恶，而舒积愤，又非甘作逸民者，可以观公之志矣。”此诗章法独特，前三句连韵作一顿，为杜甫自创的“连章体”。

全诗层次井然，首尾相应，承转圆熟，结构严谨。诗人感情深沉而忧伤，悲愤之情融于全诗。诗中情景相生，比兴兼具，沉郁含蓄。正如《杜臆》所评：如诗“先言鸟‘求曹’，以起次章‘弟侄’之伤。次言‘心似灰’，以起末章‘南山’之隐。虽分三章，气脉相属。总以九回之苦心，发清商之怨曲，意沉郁而气愤张，慷慨悲凄，直与楚《骚》为匹，非唐人所能及也。”



张秉杰老人辞世已近三载，可他的音容笑貌却不时在我的心中浮现；在他身边工作时那些生活片断也随时会勾起诸多回忆。怀念在心，永恒不灭。然而哀思的寄托，有时需要一种方式。苦觅着，冥想着，不经意翻出 17 年前他尚健在时给他的一封信件底稿，默读之下，感慨系之；往事历历，难以释怀。忽然作想，天若有灵，以此遥寄于他，或许不失为心灵深处另一种纪念。

给张秉杰主任的一封信

张主任：

您好。

在建党 77 周年纪念日里，您伏案作了自己《一生回忆》的文章，我拜读了，颇受教育。千把个字就略述了从入世到落笔 69 个春秋的坎坷生涯。简洁明快之至，正是您的个性所在。您说：“选这个日子梳理思绪，回顾平生，旨在坦诚表白自己，期冀昭示子孙”。文章本就震撼了我，而这句话更将我震颤着的心揪紧了。直至我的思绪被拉回到在您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您当了我三年的直接领导，屈指算来，离开您竟有 15 个冬夏了。这期间，我虽是一直在文案上做事，却不曾有一言半语的文字给您问安。若不是您回忆的短文将我从冗务圈里唤出，不晓得何时才能生出写信给您的意念来。

我和您相识于 1981 年春户县供销系统第四期青工培训班的结业典礼上。您当时以县供销社党组书记兼主任的身份前来讲话，我作为本期学员代表登台发言，就站在您的身边。发言时，校领导向您耳语说“这就是班上第一名”，虽是耳语，我亦听得真切。大概是这句话的效用吧，会后您单独相了我的面。诚惶诚恐间，坐在旁边的校长似乎早有准备地拿出一道关于供销系统职工教育的调查题目，要我以此作文章，并言明是您给的命题。您点了点头，问我咋样，我如何作答的，追忆不起，依稀记得两周之后将写好的调研报告呈送于您时，是一个清早。您接过稿子边看边改，改后就批给秘书股正式打印上报了省供销社。没想到这份稿子受到省供销社的充分肯定。我深知，肯定的当然是您抓的那项工作，而您却从那份稚嫩的材料中认识了我。从

此,我就为钢笔吸饱了墨水,走上了拙笔弄文之路。在这段短暂的人生经历中,您对我的影响之大,印象之深,使我今天提起笔来仍不肯相信离开您的身边竟有 5000 个日夜了。尽管时光能将一切冲淡,可伏案而思,您的一言一行却依然在我脑际闪现。

您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给了我做事必须认真的启示。起初写材料时,大都是调研方面的,虽属练笔之举,可给您交稿时,有三个关口总让我握着一把汗。一是文字关。您对“大大”“极为”“很”“最”之类的副词尤为反感,挥笔就抹。并告诫我不要写过头话,说过了头,就不可信了。二是素材关。每一份材料中所罗列的事例,在我看来已是筛选过几遍的,可您总能寻出一些“牛头不对马嘴”的逻辑错误来,并结合材料用途,和蔼而不失严肃地讲些业务方面的常识启发我,这么一听,也便觉得自己的可笑无知了。三是态度关。材料连得紧了,难免耍点敷衍了事的小聪明,这自然逃不过您的法眼,而且会严厉批评:“怎么会是这样的态度?这样既要误了眼前的工作,更会惯出坏大事的毛病,很可怕的。”您的话还未落音,我的汗已渗出额头。如果说,后来的工作中,我还能赢得几句“认真负责”的赞语,起根发苗该在这里。您大概也看到了那通批评所产生的效力,所以,在我的材料稍有长进的时候,您便适时地把一些总结、讲话之类的所谓大材料压给了我。用您的话说:“不劳其筋骨,苦其心志,怎么成得了大器。”那时我还不太懂得这句话的含义,随着额际线的加

深,玉壶一片苦心的昭示只有自知,尚且弥珍。1982 年春节后的工作筹备会期间,您真的以重负来练我的膂力了,给我的任务不仅是起草会前的工作安排意见,还有三天之后的大会总结,更兼大会记录,包括下组收集讨论意见。就在我兴奋又惆怅的慌乱中,您对我说:“感到压力了吧,别怕,我帮你。”就这样,您为我所担当的每项工作都进行了具体细致的场外指导,让我一下子有了方向和信心。尤其是那份大会总结,唯一的起草时间只能是总结会的前一天晚上。记得那天下午的各组召集人汇报会后,您就把您和我关在同一间小房子里,一大堆素材放满了床,从提纲的草拟到素材的选用,您是一环扣一环启发着我的思路。正式动笔后,我写一页,您改一页,我一口气写出,您一口气改完。这时我以为您会去休息,您却还要等清抄稿出来后再审。凌晨五点我交上稿子,您让我先休息一会儿,说需要清抄时再叫。我躺在床上等着您的敲门声,可是等到天亮,也没听到您的呼唤声。我暗想,糟了,一定要返工了,蹑足轻叩您的房门,不料开门见佛,您微笑着推稿子说:“不错,通过了”。就是这一句话,让我当下涨红了脸,心中那个激动,那一份释然,简直不亚于国际赛场上获取了金牌,更胜于跋山涉水后的一觉酣睡。激动之余,我似乎从您的身上又看到了什么。随着阅历的增加,我才感觉到我从您身上所见者,原来就是人们常说的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而您的这种态度不仅表现在对工作投入忘我的热情上,而且也表现在

对下属成长的关心爱护上，之所以我的文字工作一直能够基本适应不同的工作环境，与您的熏陶是绝然分不开的。

您严密审慎的领导作风，给了我做事务必慎重的启示。在您身边工作的后期，供销社已被推向了改革的前沿。由于户县供销社是省、地、县农村商业的老先进集体，因而，省供销社一开始就把改革的试点目标定在了户县。这个深层次问题，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就像捧读一本天书那样难懂，可庆幸的是在如此难懂的天书上，您拍板过的两件事却使我读懂了您立足实际，大胆决策的领导作风。一件是您对农产品收购问题的决策。当时县北一带的农民对辣椒、大蒜、苹果等种植业的发展情有独钟。但在供销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部分职工在如何处理社会效益和企业效益的关系上出现了一时的思想混乱，对农副产品产前、产中的指导不是那么精心了，对产后的服务也不是那么主动了。反映在工作中便是一个经营方向模糊不清的问题。为此，您让机关干部下去开展了大规模的调研活动，您当时带着我跑了西宝公路沿线的所有基层社和一些农户，还让我带着您列出的提纲，去卓西、燕坪寨等村蹲点调查，从面积到产量，从品种到成本进行全面了解。那时正值阴雨连绵的秋季，我白天打着雨伞穿着胶鞋去村里搞调查，晚上回到基层社整理材料，一口气从深秋干到初冬。就是这样，您通过对大量调查材料的分析研究，集思广益，最后决定：供销社的体制不论怎样改，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服务

的宗旨不能改。并以这个观点为题，在供销社农副产品收购工作会上讲了半个上午。那次会议后，户县的农副产品收购工作和农副产品的外贸出口工作都上了一个新台阶，赢得了农民的好评，受到了省、地业务部门的表彰。另一件，是您对增强企业经营上的灵活性方面的一项决策。农贸市场的开放，一下子把供销社塞进了国有商业与集贸市场的夹缝中。您带着如何走出一条适应供销社商业发展的新路子这个问题，又动员机关人员到田间地头去搞调查研究。您借鉴外地经验，结合当地实际，决定打开供销社的门户，开创工商联营、农工商联营、商工商联营、批零兼营的新路子。大王供销社与西安市纺织品公司联手经营的业务就是您的这个决策出台后开展起来的，并被省、地供销社作为改革试点的成功经验推而广之。上学期间，我把这两个例子引进了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的批语是：“领导艺术是一门科学，文中的那个决策者从实际出发，严密审慎的领导方法是科学的，值得学习，你若能从里面得到它的真谛，便可大有用之。”您的领导作风本身就给了我颇大的启示，老师的评语又是这么中肯，可我就是学不来。看来任何东西一旦上升到艺术的高度就非一日之功了。但您从实际出发，严密审慎的领导作风却成了我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面镜子。

您雷厉风行的务实精神，给了我做事就要果敢的启示。“啥事都要攒前不攒后”是您常说的一句话，工作上您也是这样做的。1981年

●文苑●

腊月十七，您安排机关全体干部分组下去检查仓储工作，我被分在了去山区的那个组。上午10时部署完工作，您当即宣布会后立即出发。我当时一愣，可那些老同志却显得较为坦然，下来后才听他们说早已习以为常了。虽是数九寒天，可一路上坡骑得我腋下的汗把里外几层衣服都渗透了。特别是去滂峪供销社时，那陡峭的山路骑得我脱去了鞋袜站在水泥地上降温。我这一次是从体力支出上品尝了雷厉风行的滋味儿。还有以后的秋夏两忙前农业生产资料的准备工作大检查，农副产品收购工作大检查，元旦、春节、五一、国庆等节日前工业品品种及质量大检查，都是前边安排，会后出发。每有这样的活动，您既要带着一个组下去跑点，又要听取全面汇报，而且是发现问题，现场指出，现场纠正，总是给人一种快刀斩乱麻的气势。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就只见您工作，不见休息，我在当时就弄不清您怎么能有那么旺盛的精力和凛然的锐气。现在细想，那原本是雷厉风行的务实精神在支撑着您。

您厚人薄己的做人品行，给了我做人就得吃亏的启示。吃亏，已被不少人当作谈资敬而远之了，当今更甚。而您在生活上，却从来不搞特殊化，还常告诫我，下基层别贪白吃饭的便宜。您带我下基层吃职工食堂似乎是一成不变的，甚至还要跟在职工后边排长队。让我感到我们与职工的不同待遇，就是吃完饭不用洗碗筷。以至于当我后来换了工作岗位第一次吃酒席时，竟心跳如鹿，有点云里雾

里、天上地下的不知所措起来，后因要给人家付伙食费还惹出了误会的麻烦。在劳动上，您从不退却。不知什么缘故，县供销社种了几亩责任田，地就在县城西北的机场南营房外边。每到播种、除草、收获季节，秘书股一出通知，您首先带头前往，不用说后边就会跟上一个自行车队。记得那次锄玉米，一会儿功夫您就把大家甩远了，还开玩笑把身后的人叫“八分劳”（集体经济按劳分配那阵，男劳一天记十个工分，女劳一天记八个工分）。您心情好，大家也就失去了拘束，都给手心蘸了唾沫，吆喝着要超过您，但都因不得农活的窍门，总也赶不上。到地头就餐的时候，您看饭送得少，要年轻人先吃，大家让您也一同吃，您却风趣地说：“我一吃，你们就变成七分劳了。”说着就帮后勤人员给大家盛起饭来。至今仍记着，那天是我25岁生日，坐在锄把上狼吞虎咽吃您递过来的野餐，就别有一番情致。在利益面前，您从不伸手。有一年腊月底，研究机关干部困难补助问题，当秘书股把初定名单公布后，您却带头宣布不要困难补助，让大家尽可能考虑家庭经济特别紧张的同志。但我看到您似乎一直就穿着那条染黑的日本尿素袋做的裤子，也知道您的家在农村，两个孩子正在上学，没有经济压力是不现实的，可您却作出了那种姿态。我当时就颇受感染，心想，我没有资格去申请困难补助，即使有，也会抽回申请来。

您宽严适度的长者风范，给了我做人就得有度的启示。您对我的严，使我敬畏不已；

您对我的宽,使我温暖盈怀。思想上的严、言语上的严、纪律上的严、文字上的严、工作上的严……如此一路严了过来,真实地显示了您独有的育人风格。然而,那么多“严”字的后面,仅有生活上的一个“宽”字,就足以反映出您严峻表情下的慈善心肠来。那时我几乎每晚都加班写材料,每当您夜间批阅完文件后,总要来催我休息。本来是有些倦意了,可经您这么一关心,反而来了精神,就又很来劲地写下去了。长此以往,到了1982年冬,我的眼底熬出了血,首次离开工作岗位回家看病。几天后您派人来看我,对于一个毛头小伙来说,这可是惊天动地的事,我自然是感动不已。当下就带上药,不顾劝阻,跟着看望我的领导返回了单位。您知道后,先是批评我不该不顾身体来上班,见我不愿再回家休息,您又只好说:“那就少安排些材料给你。”您的关心,让我颇为不安,似乎只有努力工作才能补偿点什么。可能是由于眼睛一直带病工作的缘故,视力一度很是糟糕,以至后来竟不得不去配了眼镜,可眼底的病却不能痊愈,急得我的父亲领着我四处求医。

那时我正处在学习、工作、婚姻三面夹攻的紧火处。在谈及人生如何摆顺这三者关系的话题时,您对我说,学习是第一位的,它是工作的资本;婚姻是第二位的,它是生活的动力;工作是第三位的,没有资本和动力,工作就无从谈起。您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没想到您的观点这么充满辩证法,这么人情入理。事实也证明,您正是按着这个思路给我时间,让我

考上了大学,还勉励我入了党;更没想到的是,不仅辟出时间鼓励我去谈恋爱,还做了我姻缘的大媒。等第一位的学习和第二位的婚姻问题解决了,我也便从您的身边走开了。回过头来想,您固有的那么多枚不胜举的“严”字和仅有的生活上的一个“宽”字,不仅体现出了您宽严适度的长者风范,而且也为我能走到今天的境地铺设了一条通途。

您顾全大局的高尚情操,给了我做人就得无私的启示。上世纪80年代初,干部年轻化政策推出后,您首先冲破了旧的思想束缚,打破了论资排辈的封建桎梏。按照干部“四化”标准,为3大公司、6个棉绒加工厂(站)、21个基层供销社配备了一支年富力强、懂经营、会管理的干部队伍,这项工作的起步比全县整整早了一年。与此同时,您把一批20多岁的小伙子选拔进了县联社机关。而实行领导干部新老交替时,您又从业务骨干中把一名仅30出头的年轻人推荐给了组织,扶上了领导岗位。在干部工作上的这3步棋是您一口气搏到底的。当时听到的议论是,没想到供销社系统实现领导班子“四化”的速度这么快;没想到领导这项工作的竟是一个即将到站的老革命。在这“两个没想到”之后,关注您的人们以为您要大干一番了,可您却出人意料地主动向组织申请,提前退到了二线,意在让年轻干部放开手脚,施展才华。这“三个没想到”成了您轻权力而重大局的见证,也为您人生的政治生涯画了一个圆圆的圈。这件事过去十多年了,每当我向周围的人提及此事时,仍

●文苑●

有人睁大眼睛表示怀疑，可您在十几年前就已经从容地做到了。在不少人看来，您是吃了亏的，可我却心里说：人，能做到这一点，也可谓心底无私天地宽了。

张主任，我不敢评价您的人生，您大半生做过的许多大事我不得而知，文中谈及的仅是我个人在您身边工作时，直接看到和听到的关于您工作及生活上的一些枝节末梢。但我一直在想，您今生用“秉杰”二字做自己的大名，一定是有所期冀的，我不愿不恭敬地直

呼其名，可当我把这二字当成一个词去默读时，竟读出了您人生的为作。可以说，不管熟悉与不熟悉您的人，只要细嚼这两字，不，这名字，一个令人仰止的形象便不难清晰可辨了。

顺祝

幸福

田周民 敬上

一九九八年十月一日

·解字·

“勿”



①



②



③



④

这是个“勿”字。甲骨文①是一把刀向左弯，刀“其中的三点”是表示用刀割东西而粘附于刀上的物屑等。而这些物屑往往是无用之物，所以“勿”字的本义当“不要”讲。“勿”字是个会意字。②是金文的形体，与甲骨文基本相同。③是小篆的写法，把其中的“点儿”变成撇了。④是楷书的写法，是直接由小篆的曲笔变来的。

“勿”字的本义当“不要”讲，这在古代书籍中是常见的，如《孙子兵法·军事》：“饵兵勿食。”所谓“饵兵”，就是用来诱敌的军队。大意是说，用来诱人上钩的军队，不要去消灭它。从“不要”又引申为否定副词“不”的意思，如《左传·庄公十二年》说：“卫人欲勿与。”也就是说：卫国人想不给。在古典文学中，经常会见到“勿勿”一词，虽然也有“匆匆”的意思，但你可别认为是“匆匆”二字之误。因为“勿勿”一词本身就有“匆匆忙忙”的意思。



6月16日下午，王锦春主任一行在市志办主任冯艳阳陪同下，赴长安区调研地方志工作。图为王主任与长安区区长杨建强、区委副书记王福林亲切交谈。

翻阅近年来长安区的地方志成果



参观长安区档案局布置的长安展厅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1625年被一些建筑民工在周至县大秦寺发现。由大秦寺僧景净撰文，朝议朗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用楷体字书写。据《中国景教》记载：人名及职衔用叙利亚文写成，共记载了23个人，其中叙利亚教士11名。碑文的主要内容分三部分：景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景教教义及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因唐朝皇帝礼遇景教而给予的赞扬。景教碑出土后引起世界轰动，具有重要意义。

